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74 期

2019 年 2 月 28 日

\*\*\*\*\*

### 目 录

#### 《边疆中国》专辑

刘晓原

引 言

第一章 领土属性转型：帝国之后

第二章 从“共和”到统合：辛亥回视

第三章 时间、形体和颜色：中国“崛起”三境界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边疆中国》引言<sup>1</sup>

刘晓原

在“中国崛起”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今天，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是，在同西方发生碰撞以后，中国近代以来经过的国家和社会转型，无论是以革命的、还是以改革的、或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究竟给中国的观念、行为乃至存在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简言之，今天的中国从何而来，如何而来？这样宏大的问题不是个别学者的探讨所能解决的。本书各章有所涉及的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十分具象的侧面，即中国近现代疆域和民族构成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国内政党斗争、民族关系、外交折冲、以及社会变动等极其丰富的内容。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对涉及领土、民族的问题，动辄以“自古以来”立论，似乎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大变局从未发生过。查二十四史，“自古……”的说法出现过一千多次。古人在议论天地精微、国是人非时，常用这种说法来标榜所谓亘古不变的至理。但是，在二十四史如此频繁的使用中，没有一次是用于论证某地某土的归属，因为古人知道，“自古帝王为治，广狭大小，规模各不相同”。<sup>2</sup> 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经常变更的。前后相连的朝代在疆域上自然会有某种继承关系，但在这种关系中，中原地区的相对稳定和边缘地带的频繁盈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穿越”前朝，更久远地继承历史疆域的情况。唯在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人曾有过摈弃“满清”疆域、规复汉代疆土的汉族民族主义设想。当前在领土问题上“自古以来”的说法，貌似依据历史，却恰恰置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于不顾：时间和空间。泛谈“自古以来”，既未表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取向，也未表明对任何一个具体历史疆域的取向。

如果非要强调中国疆域的久远历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来”的地域，对于从华夏族嬗变而来的汉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区而已。我们中国人有“祖国”的说法，这在世界各种语言中也属一种罕见的现象。据《百度百科》，“祖国是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人们崇拜、爱惜和捍卫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土地。人们对祖国的感情包括了对国家主权，大好河山，灿烂文化以及骨肉同胞的感情”。<sup>3</sup> 而到《维基百科》查一下就可以了解，世界上其它语言的近似表达，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分别是“母国”（motherland）、“父国”（fatherland）、或“家国”（homeland）。“母国”经常是表达出生的国度和族群的发祥地。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则使用“家国”，大概是为了比较贴切地表达移民家园的意思。比如在“9·11”以后，美国的国土安全局的英文名称就是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而“父国”的使用则和中国的“祖国”概念比较相近，往往表达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sup>4</sup> “祖国”在中国古代不是一个常用词。在二十四史中，只有《明史》有一处使用“祖国”：“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sup>5</sup> “天方”即今麦加。《明史》以伊斯兰教发源地为“回回”的共同“祖国”，实际上表达的是上述“母国”的意思。相比

<sup>1</sup> 刘晓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上海华东师大紫江学者讲座教授，所著《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这里介绍的《引言》为该书的第xiv-xxvii页。

<sup>2</sup> 《宋史》卷445，列传第204，文苑七。

<sup>3</sup> “祖国”，《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3027/5095059.htm>，2015年9月23日查询。

<sup>4</sup> “Homeland,”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meland>, 2015年9月19日查询。又见 Alexander C. Diener and Joshua Hagen, *Bord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43页关于 fatherland 同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成的关系。

<sup>5</sup> 《明史》卷332，列传第220，西域四。

之下，“故国”一词在中国古代倒是被经常使用。中国处在分裂状态时，大小诸“国”兴亡无常，人民颠沛流离，“故国”于是成为背井离乡之人对自己的已亡之国、已离之土的称呼。所谓“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这和美国人在新大陆的“家国”唱“星条旗永不落”的意境正好相反。<sup>1</sup> 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帝国疆域，都是统治族群从其最初的“母国”、“祖国”、或“家国”向外扩张的结果。<sup>2</sup>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帝国也不例外，在所谓“大一统”时期，分属多个不同族群或政治集团的“故国”被一个个纳入统一王朝的麾下，而在所谓分裂时期，不同族群、甚至是同一族群的多个集团又得以各自为“国”。

显而易见，在中国历史上，“疆域”远比“祖国”要抽象且漂移不定。在今天，当涉及到具体疆域问题时，深究之下，“自古以来”的说法往往又不得不得被“汉唐以来”或“元明以来”这样不具备亘古不变的历史真理感的概念所替换。但是，即使是这种进一步界定的“自古以来”的说法，依然反映出对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巨变的无知或误读。因为这种说法不了解，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经历了划时代的领土属性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宗藩朝贡体系下的疆域观念和归属关系，嬗变为源自西方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近现代主权观念下的领土归属关系。不了解中国领土属性的近现代转型，自然会把古代和现代的主权观念、领土归属关系混为一谈。

中国历史上秦汉两朝最重要、最久远的影响，是使统一王朝成为古代中国的典型国家形态。但是这些王朝治下的不同族裔的臣民，是否以王朝国家为共同“祖国”，则另当别论。以后的历朝历代，无论是因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还是因外族入主中原而形成的一统王朝，都是在“天下”观念之下，以中原为中心构建的多层次王权结构，即宗藩朝贡体系。以“天下”观视之，寰宇之内，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权，与远近亲疏各不相同的“内地”、“边地”、“藩属”、“贡国”、“客国”等等之间，发生错落有致、利害各异的关系。这些关系或是直接统治，或是间接“羁縻”，或是布化“王道”，或是“恩泽四海”，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贸易内涵。这个体系的特点，首先是“上国”与“下国”关系的不对称性，其次是由内向外、益远益疏的多层次性，再次是王朝主权边缘的模糊、多变性。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上，也不乏中原王朝与邻国画界并放弃“上国”身份的例子。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中原王朝势弱，不得不同相关邻国执“敌国礼”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与近代以来的平等国家关系绝不可同日而语，乃是中原王朝与实力“匹敌”的邻国之间一种权宜的对等关系，依然是多阶梯、多层次关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多阶梯、多层次的“国”际关系不仅实行于中原王朝与邻国之间，也通行于诸多亚洲国家的相互关系之间。显然，这种源于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与近现代通行的、源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有极大的差异。

认识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不能脱离对两个历史过程的明确认识。第一是清代疆域的形成，第二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清帝国疆域走完了从扩大到巩固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清帝国得以在以后一个多世纪里，以雄踞东亚大陆的东方强国的地位，与西方列强长久相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的军事、外交、贸易的多重压力下，东亚固有的国际关系体系逐渐解体；东亚诸国被迫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国际范式，对自身的国家形态、国际行为和立国理念进行重新构建。中国的重新构建过程包括放弃对一系列“外藩”（如朝鲜、越南、缅甸等）的传统“上国”地位；试图取得或巩固对边地“内藩”的直接统治主权（蒙古、新疆、西藏、满洲〔东北〕皆在此例）；放弃以往维持“缓冲”边疆、隔断内地汉民和边疆民族联系的安全方略，代之以移民实边、促进民族融合的新政；放弃过去四海一家、天下共主的理念和相应做法，采取以法律条约的方式，确立国家边界和国内、国际主权；放弃天朝心态和华夷之辨，以万国之一的平等身份，同与国相处。对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铁与火

<sup>1</sup> 《史记》卷118，列传第58，淮南厉王刘长、衡山王刘赐。

<sup>2</sup> Dienner and Hagen, 32.

相映，血与泪交融的过程，充满抗争、屈辱、被迫和无奈。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以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风貌，进入世界历史大潮的开端。因此，在上述两重意义上，清帝国是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母体。

而紧随清朝的中华民国，由于内战频仍和强敌入侵，未能在实际上全面继承清帝国的疆域。在此期间，还发生了蒙古独立这样的重大事件，使现代中国对大清帝国疆域的继承大打折扣。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民国的重要性在于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坚持了对前清疆域主权的继承。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当西方国家的代表提出需要对“中国”加以定义，即对中国对“本部”的“主权”和对“疆部”的“宗主权”做出区分时，中国代表顾维均立即声明：“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讨论任何企图更改中国领土边界的议题。……治权完整的原则必须视中华民国为一体”。<sup>1</sup> 此外，在中华民国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政治话语也完成构建，中国主流政治的左翼和右翼同在这一语境内推进自己的政治日程，“祖国”也从《明史》中表达族群起源的生僻概念，变身为“中华民族”对外抵抗和对内统合过程中的政治熟语。<sup>2</sup>

各种历史因素的总汇决定了，尽管中国在 19 世纪中叶便开始了以清帝国疆域为原型的领土属性近代转型，但只是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才具备了全面廓清自身地缘形体的条件。<sup>3</sup> 1957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讨论中缅边界问题时讲到：“我们承认历史的客观事实，要还它本来面目。我们过去的历史是封建王朝、封建帝国的历史，封建王朝的立场跟新中国的立场是不同的。而时代不同，制度也不同，周围的情况也不同。……如果我们把所有史书都搬出来作为讨论我国边界问题的依据，那整个亚洲都要翻腾起来。所以历史上的边界情况，只能作为参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这三个朝代的有些边界谈判的材料，才是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sup>4</sup> 1949 年中国的政权更迭对中国外交事务在人员经验、知识结构、以及办事机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断层。<sup>5</sup> 在 20 世纪中期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国际方针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对周边关系的处理。但无论如何，周恩来提出的处理中国边界悬案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是符合中国领土属性近现代转型的实际情况的。以清朝末年为起点的历史依据，以现代国际通例为基础的法理依据，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为他们的新政权塑造和平环境时奉行的原则。今天已经重新强盛起来的中国，如若从自身历史中寻求“自古以来”的智慧，就应谋求成为一个积极、理性、自律、宽柔、包容的新型东方世界强国。周恩来的两个“依据”，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成为中国处理领土纠纷时的原则。

中国的周边邻国，大多数在历史上曾和中华帝国发生过某种古代意义上的从属关系。今人对这种历史关系的记忆和解说，既可以把这种历史遗产化为当代亚洲国际社会交往中的永久财富，也可以变其为随着国际气候的变化而肆虐滋生的潜在病毒。对中国自身来说，归根到底，在领土问题上“自古以来”的说法，不仅是误导世人，尤其会阻滞历史智慧对中国大战略的贡献。任何国家的国际大战略的制订，都离不开对地缘政治的考量。在中国古代多国纷争的时代，产生了“远交近攻”和“近悦远来”这样立意和目的都截然不同的地缘谋略。其后中国的历代王朝，依据自

<sup>1</sup> 引自 Harley F. MacNair and Donald F. Lach, *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50), 第 231-2 页。1914 年的《中华民国约法》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

<sup>2</sup> “祖国”一词的近代历史，尚有待研究。笔者猜想，“祖国”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可能近似于 Vaterland 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关系。

<sup>3</sup> 有关综述，见沈志华，“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二十一世纪评论》，2014 年 6 月号（总 143 期），第 22-32 页。

<sup>4</sup> 《中共中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宣传通知》，1959 年 9 月 21 日。

<sup>5</sup> 有关研究见 Xiaohong Liu, *Chinese Ambassadors: 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身对安全环境变化的判断，将这些先例或视为圭臬或束之高阁。古今国际战略的制定，大概不离开对以下三宗的判断：对国家安全地域的界定，同紧邻国家的邦交，与主要对手的博弈。中国国势发展到今天，又进入了对大战略做出积极调整的时期。随着中国对全球事务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界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东方元素日益彰显的新的历史单元。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战略思维，应是兼容东西方文明积极内容的前瞻，而不是对中国历史上所谓“盛世”的回归，更不能步西方国家由强而霸的后尘。

中国和整个亚洲经过近代以来的大变局、大变形，在地图上展现的形体已面目全非。其后果不仅涉及中国和邻国的关系，更涉及中国内部人群的关系。今天在亚洲地面上已不再有拉铁摩尔所曾描述的那种漂移不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浪漫“边疆地带”，取而代之的是使国家相互分割又彼此贴身而立的严厉的国境线。<sup>1</sup> 亚洲的人群、社会、国家在西方“现代国家”范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重新调整生存和交往方式。在国际舞台，国家之间对领土分清你我。在国内，中央政治权威和边缘社会之间也发生了“统合”与“自治”乃至“分离”的角逐。耶鲁大学教授杰姆斯·斯科特关于“左米亚”的著名研究，提出在亚洲还有一片“无国家”的净土，那里的人们凭“不被治理的艺术”暂时逃离了现代国家权力对其生活的干预。<sup>2</sup> 然而，“世外桃源”一旦被外人所探知，就难逃灰飞烟灭的命运。毕竟，现代国家的特性之一，就是囊括无遗的统合意识和无孔不入的统合手段。中国国家权威以国境线廓清地缘形体、确立同邻国的相互主权界限，同时也就是将边界以内的所有人群，置于国家的统合运作之下。

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化，同时招致的是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一个“固有困境”，即“在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承认民族自决权而产生的矛盾。而族群间的模糊文化分野和国家间的清晰政治边界绝难调和”。<sup>3</sup> 中国历史上以中央王朝为正统中心的“天下”体系，维系的是一种层级对等、以“礼”相待的“国”际关系。只要各国各安其位，不相侵扰，中央王朝便乐得“因俗以治”，任各国自为教化。<sup>4</sup> 这种边缘的“高度自治”并未给中央王朝带来永久的安宁。唐代高适就有“戎狄本无厌，羁縻非一朝，饥附诚足用，饱飞安可招”的感慨。<sup>5</sup> 美国学者汤玛斯·巴费尔德将这种“饥附”和“饱飞”现象，分别称为中亚游牧军事政治集团对中原王朝采取的“内边疆战略”和“外边疆战略”。<sup>6</sup> 清代满人治边，理藩院总理其上，以盟旗、联姻控蒙古，以军政、军府制度理东北、新疆，以驻藏大臣、明文“章程”羁西藏。这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治边策略，使清帝国的内陆边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sup>7</sup> 但即使是非常重视边疆治理的满族统治者，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也未能根本突破中华天朝帝国有体无形、有边无境的“天下”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之间以及和后起的日本相互倾轧，争相重新界定清帝国疆域，以此为确立自身在亚洲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步骤。“天下”不再，时过境迁。处在中国周边的各种组织形态中的人群，除了在“左米亚”一类残存的三不管地带苟延，早已失去了选择“附”或“飞”的自由。进入 20 世纪以后，现代中国又给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固有的“两权之难”增添了一层中国特色。在

<sup>1</sup>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51), 3.

<sup>2</sup> James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左米亚” (Zomia) 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教授 Willem van Schendel 根据藏缅语族中 *zomi* (高地人) 一词造出来的，指从大陆东南亚到阿富汗的大片山地地带。

<sup>3</sup> Diener and Hagen, 45.

<sup>4</sup> 《明史》卷 90，志第 66，兵二。

<sup>5</sup> 唐 高适：《睢阳酬畅大判官》。

<sup>6</sup> 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sup>7</sup> 有关清代边疆政策的较全面的研究，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对清代因地制宜的边疆举措向具有全局观的国家外交政策的近代转型，做了详尽的探讨。

17-18 世纪，西方国家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重定国际规则的同时，也在国内完成了从王权向民权的转变。而中国在接受并按照西方规则重塑地缘形体和学步现代国际行为的同时，国内民族的构建却以民权口号始，以党权实质终。由此，20 世纪历史展示的是，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威以西方国家对待国家领土的“熊抱”，取代了历代对边疆传统的“羁縻”；而以党权为根基的“熊抱”，时而表现为令人愉悦的亲昵，时而表现为令人窒息的桎梏。

本书的十个章节，虽然完成于不同的时间，但都反映了对近代变局以来中国经历的历史转型的思考。第一章提出用中国近现代领土属性转型的视角，来观察、认识中国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发展脉络。不同于以往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是一个封建国家完整的领土、领海主权被列强破坏的过程，本章提出，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的不仅是向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衰变，还有在国家体制、国家疆域、国家观念、国内族群关系各个方面，从一个传统东方帝国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积极发展。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过程始于晚清，在某些方面延续至今。实际上，中国现代化的各个层面都与领土属性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领土属性转型的研究，是从宏观历史入手，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结构和功能发展变化的角度之一。这个角度在本书以后的各章里，都有所体现。

与任何从传统国家形态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国家一样，中国的近现代领土属性转型，包括了重塑国家体制和确定地缘形体等事关国家内涵和外延的历史转轨。这都是些伤筋动骨甚至是五内俱焚的痛苦过程。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经历了一系列屈辱的军事、外交挫败，取得了后来被称之为海棠叶形的政治地缘形体。随之而来的是以 1911 年为起点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世纪。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转型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辛亥革命是节点之一。第二章围绕 1911 年前后在中国出现的“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说明中华民国对满清王朝在疆域上的继承，既非顺理成章，亦非名符其实。有关的历史，在后来的历史著述中多被曲解，而辛亥革命给中国领土属性转型带来的内涵和外延方面的错位，尚未有论者述及。在当时支持和反对革命的政治派别之间展开的大辩论，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话语开辟了先河，而其中提出的与领土属性转型有关的一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圆满的答案。

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最先在欧洲出现，然后在欧美殖民扩张的狂潮中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因此，对非西方国家来说，领土属性及其它国事方面的近现代转型，便成为一个追赶“先进的”西方的过程。近代以来，西方的中国事务观察家们自然采取了俯视中国的文化优越观。而投身于重振国威的中国改革者和革命者，又何尝不是以“驾美迭欧”、“超英赶美”为己任。在这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框架内，近代以来中国衰而复兴的发展轨迹，是用同西方的“时间差”来标记的。第三章以近代东西方文明碰撞后产生的“社会时间差”为框架，重新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美关系。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中心，是用外交手段扶持中国的所谓强国地位，以此鼓励中国政府继续抗战。华盛顿对中国的强国之路的设计，是站在西方立场上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加上美国对作为小伙伴的国民党政府的期望。但是，即使是处在抗日救国的严重时刻，刚刚摆脱不平等条约和国际孤立的中国政府，已经显示出向中国传统国际行为回归的意向。换言之，究竟是按西方标准，视中国的崛起为年齿尚幼、不堪重任的中华民国逐渐成熟的过程，还是回视东方几千年，视中国的复兴为分合有期、兴衰往复的中华古国的又一次更新。这个问题在战时的中美关系中开始凸显，延续至今，成为认知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起点。

在十九世纪，西方迫使东亚各国与欧美对表，按民族国家的范式界定国家形体，在国际舞台重新学步。在二十世纪，西方又向东亚发送了两道新的冲击波。在世纪之初，源自西方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影响所及，使亚洲国家开始了自己的“颜色政治”。在以后的漫长世纪里，东亚诸国都出现了服膺共产主义的政党，为在本国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展开了斗争。二十世纪未及过半，欧美国家又将“颜色政治”推及国际舞台，形成两个冷战集团。在两大集团的

国际角逐中，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发展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东亚国家亦如是，对来自西方的“形体”、“颜色”、“集团”的三道冲击波，疲于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东亚国际政治的转折意义就在于，除了因效法欧美帝国主义扩张而自食其果的日本，其它东亚国家都逐渐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开始了民族复兴。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东亚国家和社会，其发展仍处于“形体政治”的阶段，同掀起“颜色 / 集团”国际政治的西方超级大国，在政治诉求方面发生了极大的错位。东亚国家在战后国际政治中表现出极大的能动性。当美苏以冷战的方式试图在亚洲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时，东亚国家的政治力量却在用热战推动自己的政治日程。超级大国对东亚国家内部热战的回应，又加剧了战后国际政治的冰火两重天、欧冷亚热的分裂局面。第四章以战时中美之间针对战后朝鲜问题的外交折冲为例，进一步说明东、西方国际政治中的“时间差”。战后美苏对朝鲜半岛的冷战分割，是西方“颜色 / 集团政治”对亚洲“形体政治”的粗暴干预。这种干预在战时盟国外交中已初现端倪。

所谓“民族国家”范式的尴尬之处在于，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多数是多民族共同体，极少单一民族国家。于是“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就成为民族国家范式不可化解的一对内在矛盾。战后朝鲜的例子更进一步说明，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近现代国际政治中，大国强权又凌驾于其它权利之上的。如果不把所谓国内、国际事务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那么国际强权、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反映的就是由强及弱的三个相互抗争的力量等级。自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通行的国家形态以来，追求民族自决的弱小民族常常与国际强权国家联手，向为其居所的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壁垒进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中国所面临的蒙古、新疆、西藏问题，就一直笼罩在大国干预的阴影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地深层次介入亚洲事务的机会，开始步英、苏、日的后尘，对中国的边疆民族事务产生影响。第五、六两章对战时和战后初期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战略思考和政策行为，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中国的重新统一是当时东亚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一般概念。对中国本身来说，统一其实有三重含义：收复失地，结束国共之争，统合离散的边疆地区。三类分裂，各有其历史根源和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复杂状态。美国政府对收复失地的支持仅限于对日本的清算，对国共之争是急于调解而不得其道，对同中国离心离德的民族边疆地区如蒙、藏、新，美国则采取了游离观望、相机行事的方针。美国战时、战后的对华政策，尤其与外蒙古的独立和内蒙古的分离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强权、主权、自决权三者之间的纵横捭阖，莫为此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整个西方制度、观念、价值、行为方式的领军者和卫道士。而苏联在继续参与主流国际社会的同时，在自己周围构建了一个被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次级国际社会。从理论上说，在这些“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奉行的是以国际主义为宗旨的另外一套国际行为范式。于是，对相关国家来说，一般国家关系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谓共同利益所覆盖，一切权利服从于宗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对国民党军事、政治斗争的全面胜利，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也因此从单纯的党际关系开始向国家—政党双重关系嬗变。在各种权益交错、长短期政策目标矛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现行国际制度冲突的极端复杂的关系中，北京同莫斯科的同志式交往与国家间外交纠缠在一起，双方往往是言不由衷。第七章在这样的国际场景中，对1950年中苏缔结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作出一个另类的推断。以在当时中苏谈判中未被纳入议事日程的外蒙古问题为主线，本章试图呈现在集团、国家、民族、政党、领袖人格这些沉重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元素之间，毛泽东和斯大林如何缔造了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同盟。在西方观察家眼里，中苏同盟成就了铁板一块的欧亚共产党国家集团。实际上，看似连接中苏的外蒙古，在莫斯科谈判前后一直是一个会把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同志式话语引入歧途的难题。其难就在于，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还是集团政治的战略需要，都无法使双方改变苏联继沙俄之后，将中国海棠叶形的版图拆解为雄鸡形状的历史方向。

1950年的中苏同盟，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冷战漩涡的标志性事件。归根到底，冷战是西方内部在两大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斗争。在承受了来自西方的三波冲击之后，重新在世界定位的东方大国中国，与这种西方的“内战”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进入冷战的时间和方式，还涉及冷战过程中北京为自己设定的立场的变化，以及冷战结束时的所谓胜、败对中国的意义。第八、第九两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西藏问题为个案，对中国进入冷战和在冷战过程中易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在西藏确立主权，是完成对中国近现代地缘形体统合的重大步骤。同时，北京制定的在西藏地区逐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使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在西藏行使国内主权，把西藏纳入同资本主义外部世界的对抗，并在喜马拉雅山一线完成国防设施。这些步骤都滞后于北京对西藏领土主权的宣示。1949年以后，北京对西藏的政策设计需要面对三项时间跨度不同的历史日程，即领土属性转型，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同西方冷战集团的国际对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的历程所示，由于这些日程牵涉国内外种种不同的复杂和相互矛盾的因素，北京针对每一项历史任务所作的最初政策设计，都在实行过程中发生了重大改变或扭曲。对北京来说，这些政策的阶段性结果，往往是某些方面的成功与某些方面的挫折纠结在一起。尽管这段历史发生在冷战的年代，但是其中各种关系、冲突的根源和影响所及，远非囿于冷战的历史眼界所能审视。

作为全书的收尾，第十章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在经过了近现代将近两个世纪的转型、革命、战争的洗礼以后，仍然处在一种“边疆国家”的状态。“边疆国家”是相对“整合国家”而言。我曾经对“整合国家”的特征作过如下概括：

（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sup>1</sup>

“边疆”是中国的故态，“民族国家”则是近代以来中国不得不采用的舶来品。中国的未来是继续保持“边疆国家”的常态，抑或是向“整合国家”继续嬗变？这个问题本书无法回答，也不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

---

<sup>1</sup> 刘晓原，2011，“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文化纵横》2011年第6期，75-76页。



# 《边疆中国》第一章

## 领土属性转型：帝国之后<sup>1</sup>

近年来国内对于所谓三边（边疆、边务、边政）问题加强了研究力度，提出了研究古代和现代边疆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但是这些课题没有包括中国疆域及其有关制度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也就是有关近代转型的课题。一般认为，中国领土主权在近代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封建国家完整的领土、领海主权被列强破坏的过程。<sup>2</sup> 这种“破坏说”旨在论证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衰变。但是这个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的贬义概念，不能反映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开始的近代转型所带来的积极结果。本文试图从“领土属性”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一些问题。

### “领土属性”

对“领土属性”的研究是近年来哈佛学者查尔斯·梅尔提出的。他认为，目前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冲突、大规模政治迫害、种族灭绝、以及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毁灭，而忽视了近现代世界史发展中最基本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政治进程之一，即所谓“领土属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随之而起的各种危机。他对这个概念的描述如下：

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仅指由控制边界内政治空间而形成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直到最近，这些特质至少为民族的和常常是族群的身份认同建立了框架。领土属性并非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政治形式也是历史性的，有开端和终结。但是，它从未遵从以世纪为标志的时间轨迹，而是为政治、经济提供了构建于地域空间的各种结构。这些结构在从1860年到1970或1980年的这段时期里取得了理所当然的地位，以后遂开始解体。<sup>3</sup>

“领土属性”是笔者对 territoriality 一词的试译。与这个词相关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之一，extraterritoriality（治外法权）。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这种法律上的特权使外国人在中国占尽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各个方面的优势，因此实际上成为列强在中国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的代名词。同时，治外法权不是一个僵死的法律用语，而是保证列强在中国从事各种合法和非法活动的一种机制，也是列强相互认同以别于半殖民地中国的一种“框架”。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发生，是中国领土属性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虽然领土属性在世界历史中的演进并不遵从世纪更迭的轨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也不落朝代兴替的窠臼，其发展变化的明显时代特征却是毋庸置疑的。国家、社会实体与在法律意义上明确界定的领土的结合，是近代领土属性的显着特征。因此，近代领土属性的含义首先包括了明确的国家疆界和与这种疆界紧密相关的国家主权，其次包括了在近代国家意识指导下对社会的组

<sup>1</sup> 本文曾以“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刍议”为题于2005年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网站。

<sup>2</sup> 马大正、刘狄，《二十世纪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54-155，177页。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349-350页。

<sup>3</sup> Charles S. 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3) (June 2000): 807-831.

织、人口的管理、资源的利用等等。梅尔指出的近代领土属性确立的年代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历史，他所宣称的领土属性的开始瓦解也仅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政治预言。但是，近代领土属性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结构、功能的演变，值得密切注意。

## “历史上的中国”

既是讨论近代转型，国内外学者在讨论中国历史疆域时都使用的一个概念——“历史上的中国”——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出发点。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以清代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的最终地域范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流派则认为清帝国和“历史上的中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地域概念。更有学者认为以国家地图来界定近代以前的历史活动是用近代以来的“领土主义”(territorialism)倒读历史，正如“一个粗浅的考古学家置历史源流于不顾，把出土文物整齐地陈列在博物馆里一样”。<sup>1</sup>

毋庸讳言，有关“历史上的中国”的争论会很容易地滑入非历史的思辨。事实上，无论对清代疆域如何定义，近代中国无可改变地是从清代嬗变而来。清代的国家、社会机制，以及领土属性，即为研究中国近代转型的直接对象。同时，中国历史上自有自己传统的“领土主义”，其以“版图”藉民画地的实践历代不衰，其对王朝领土维护之严峻，也不稍逊于近代。这个历时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时空上犹如一条长流不息而又随四季消长的河流。清代在烟消云散近百年之后仍受到史家的格外关注，不仅因为它是近现代中国的直接母体，也因为中国的季河在清代曾一度非常宽阔。

清帝国疆域之广阔为世所共知。清朝雍正皇帝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也曾把现代中国的“地大”与满族先人的开疆拓土联系在一起。<sup>2</sup>但是，在任何时代，领土属性的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疆域的盈缩，也不只局限于边疆事务。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变动。民国以来关于中国地图的形状从秋海棠叶变成了雄鸡的说法，可以用最直观的视觉形象激起国人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领土的义愤。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领土属性最表面的变化。

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不仅牵涉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宏观举措，也影响到中央政府管理民事和控制、利用国土资源的具体操作。可举今年国内的一个史学新成果为例。青年学者刘文鹏在他的新着中详细考察了清代驿、站、塘、铺与前代制度转承发展的关系，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套体系如何以线连点，使清廷在帝国扩张过程中得以保持信息畅通和有效施政，而后来又如何在西方冲击下被近代邮政制度所取代。<sup>3</sup>这种结构性、功能性近代转型的意义和内容，不是仅仅通过论述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陨落所能揭示的。换言之，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的领土属性转型，已开始以“民族国家”的风貌重新构建中国。

“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世界历史上的孤例。的确，比较史学可以指出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和中国在秦汉时期分别完成了统一，而后却分道扬镳。欧洲形成了自己的多国体系，为以后的“民族国家”时代铺垫，中国却长期保持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传统，至今不衰。<sup>4</sup>但是，统一和分裂

<sup>1</sup> 国内的有关论述见马曼丽，《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马大正、刘狄前引书，以及马大正前引书。美国学者的代表性观点见 William C. Kirby (柯伟林)， “Lesso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o the U.S. Congress, April 1998,”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1(1) (Spring 2004): 15-22; David Ludden, “Presidential Address: Maps in the Mind and the Mobility of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4) (November 2003): 1057-1078.

<sup>2</sup> 马大正，前引书，25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卷，262页。

<sup>3</sup> 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sup>4</sup>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不是中、欧比较的唯一视角。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经历了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很长的历史过程。如果不计国家大小，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欧洲诸国和中国在领土属性方面仍有不少“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如国际边界不明确，疆域概念模糊，国家的内外事务职能相混杂等等。

直到1648年以后，这些相似之处的历史意义才被双方国际行为规范日益明显的差异所超越。在这一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立，标志着世俗主权王朝对普世性帝国和教廷权威的的决定性胜利。同时，瑞典和布兰登堡之间的双边外交开创了欧洲国家以界石标记国界的先河。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内和外交事务到十八世纪初完成分离，随后便出现了专职外交机构。直到十七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本国国土尚无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属只能向他提供几种差别甚大的粗略估计。其它国家的情形更差。每当它们之间的战争和条约涉及领土时，通常只能以地区而不是明确的国界做出安排。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分别完成了用近代勘测技术绘制的国家全图。<sup>1</sup>

正当欧洲国家逐渐完成各自近代领土的构建时，清朝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业，继而维系中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拓展了清帝国。但这并不是说，清朝在延续、扩展“历史上”的中国时，没有与近代欧洲同步的发展。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前叶，清帝国在勘疆画界方面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甚至一度领先。1646年多尔袞命令对帝国土地人口进行全面勘查。1689年康熙大帝创清朝以双边条约确定国际边界的先例，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而后康熙又利用耶稣会教士的知识技能，历时十几年（1718年，一说1721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从而“使中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地理制图学上成就最高的国家”。<sup>2</sup>

但是，康熙帝及其后两代帝王在这方面的成就，并没有成为中国领土属性向近代转型的契机。就国际关系的实践而言，“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某些行为的发生与否，而在于不同立国观念下总体机制的差异。例如，近代欧洲国家勘界绘图是在“民族国家”国际竞争机制下的政治行为。清代的地图绘制虽然也和安邦定国的政治行为相关联，反映的却是“昭中外一统之盛”的天朝观念和“昭代典章”的皇统目的。<sup>3</sup>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的二百年中，中国和欧洲在领土属性的演进方面再一次分道扬镳。清朝将中国的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的治国御边传统发挥到了极致。<sup>4</sup>与此同时，欧美诸国则以法制为支点，以实力为杠杆，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扩展“民族”利益为终极目的，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式把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强行推向世界。

## 近代主权

显然，对主权的定义和行使是领土属性的中心问题之一。从国际法学的观点来看，“主权是一种关于终极权威的理论，而非对实际状态的描述”。在历史上，主权是三种政治实体（普世的、民族的、地方的）相争的主要内容。<sup>5</sup>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可以被定义为“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海防主权”的“封建主权国家”。而在传统的东亚国际体系内，中国以其内、外藩属的“终

---

University Press, 1997), 76-77.

<sup>1</sup> Martin van Crevel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86, 133-134, 143-144.

<sup>2</sup> Laura Hosteth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 70, 75-76. 靳尔刚、苏华，《职方边地——中国勘界报告书》，商务印书馆，2000年，上册，11-17页。

<sup>3</sup> 金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5，58页。

<sup>4</sup> 关于中国古代“一国多制”的传统，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160-169页。

<sup>5</sup> John Boli, “Sovereignty from a World Polity Perspective,”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Contested Rules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55.

极权威”，拥有“绝对权”。<sup>1</sup> 问题仅在于，任何概念都有鲜明的时代性。从今天的眼光看，“绝对的”“封建主权”本身就是相对的。以“天下”观念为特征的古代中国主权观念是普世性的，它和近代欧美以“民族国家”观念为核心的主权论大异其趣。前者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如内、外藩属，进贡国）的相对主权，在理论上维系了一个尊卑有序的世界。后者鼓励“民族国家”追求各自的绝对主权，造成了近现代国际舞台上的无政府状态。

通行于传统东亚国际体系内的主权观念和实践，尚待进一步研究。相比之下，源于欧美的近代主权论则被冠之以“国际”的头衔，成为近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对于国家主权的权威定义包括以下四个内容：（1）相依主权（interdependent），即对跨境人员、物资、和思想意识的管理权；（2）国内主权（domestic），即国家对内权威和控制的有效性；（3）国际法律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即领土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得到的承认；（4）威斯特伐利亚主权（Westphalian），即国家权威机构不受外来势力直接或间接左右的完全自主性。<sup>2</sup> 类似的国家主权职能在传统领土机制中或许也可以找到。国家主权职能在任何时代的行使都离不开对权威和实际控制。当然，在不同情况下权威的根据会有很大差异，实际控制的标准也不一样。需要明确的是，传统东亚国际体系的常态是一元等级权利关系，而近代国际体系则奉行多元对等权利原则。

这两种体系碰撞的第一个阶段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开始了。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商人、传教士、和各色冒险家自愿纳身于以中国天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以便进行各自的事业。中国的统治者也把他們想当然地视为“来化”之民或代表进贡之邦，把他們和他们的国家纳入“天下”的视野之中。清代康、雍时期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反映了中国封建主权对外来普世性宗教权威的抵抗。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使麦卡特尼碰的软钉子则表明了清政府对近代多元对等原则的拒绝。但是，在两大体系碰撞的第二幕被鸦片战争揭开之后，中国封建主权的权威和控制力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由此被迫开始。

## 转型

中国是传统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中国领土属性的转型，也意味着东亚体系的解体。东亚各国在近代的共同经验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化。另一方面，各国转型的历程各不相同。在东亚体系中孤悬海外的日本，在与列强的对抗中稍挫之后，开始急剧模仿欧美国家行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不但在亚洲国家中第一个完成近代转型，也成为亚洲史上唯一的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原被清朝视为“边藩”的安南、缅甸、暹罗、南掌（老挝）和视为“海藩”的高丽、琉球，多由中国之瓯脱变为列强之禁脔。在世纪末，清朝曾为保藩，不惜为越南、朝鲜一战，但终按“西国公法”接受越南“自为一国”，对长期与中国保持“字小事大”关系的朝鲜，也不得不在甲午战败的屈辱中舍弃。<sup>3</sup>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北半部，才以革命国家的身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又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兄弟国家”。

在亚洲国家中，暹罗的近代转型值得我们注意。这不仅因为暹罗的近代经历有别于日本帝国和朝、越、缅殖民地，也因为它在传统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有趣地位。根据泰国学者颂猜·文尼察古的研究，近代以前的暹罗和缅甸、越南一样，在奉中国为上国的同时，还在东南亚被称之为“曼达拉”的进贡体系中位列主国。处于这个体系之中的国家相互之间没有明白确定的边界，并经常卷入对各自藩属的争夺。小国为安全计，往往向两个甚至更多的大国同时进贡。比如柬埔寨，事暹罗如父，事越南如母，用双重“从属”保持自身“独立”。在英国势力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sup>1</sup> 马大正，前引书，349-350。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8-49页。

<sup>2</sup> Stephen D. Krasner,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in Krasner, ed., 2。

<sup>3</sup>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374-376页。邵循正：前引书，117页。

进入缅甸以后，东南亚各国之间模糊的缓冲地带开始被西方列强势力范围之间明确的边界所取代。在和列强周旋竞争的过程中，暹罗确立了自己以近代主权观界定的地缘实体（geo-body），开始以近代民族国家的步伐进入世界。<sup>1</sup>

由此看来，传统东亚国际体系除了中国这个大中心之外，还有诸多小中心，是一个大小包容、相互渗透的星系。在领土属性的意义上，对中华帝国的“封建集权”可以理解为在中央地区的高度集权和在边缘地区的广封众建。与暹罗一样，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就是在一种地域范围内丧失封建相对主权和在另一种地域范围内确立近代绝对主权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国家主权职能各方面及相应机构和国家行为的变化。从大的方面说，以下几个变化标志着中国由传统封建帝国的母体，脱胎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一、确立国际边界。“国际”边界在中国近代以前并不陌生。如南宋曾与金、辽以河为界，清代也数次与缅甸、朝鲜、锡金、尼泊尔等国勘界立碑。<sup>2</sup> 1793年英使麦卡特尼来华要求通商建交，乾隆皇帝斥之曰：“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界搀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严，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可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乾隆的父亲雍正对疆界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1728年安南国王请雍正相让120里有争议的疆土。雍正先让80里。安南国王又要余下40里。雍正于是有这样一番议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又云，“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为朕之外藩，毫无所分别，着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sup>3</sup> 其实，雍、干父子在疆界问题上的立场并不矛盾。他们讲的都是“天朝内地”与“外藩”之间的疆界，而非近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在他们眼里，天朝内地、内藩、外藩同归“版籍”，内地与后二者的疆界视具体情况可严可宽。而外藩以外的边界状况如何，就不是天朝的直接责任了。对这种自内向外辐射的疆界利益观，清人有用中国传统家居布局做的贴切比喻，即由堂室至门户、由门户至藩篱。<sup>4</sup> 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朝无邻国。今人若把中国历史上的藩界直接转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视雍正帝为清代“随心所欲地把土地‘划批’给外国外人”的始作俑者，就有倒读历史之嫌了。<sup>5</sup>

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天朝是在列强压迫下把藩界变成近代国际边界的。如梅尔所言，近代领土属性的特质之一是领土不再仅仅是“一片需要巡视和维持秩序的消极区域”或安全缓冲区，而是成为“资源、生计、产品、以及能源的源泉”，是实现“实力和统治的决定性手段”。<sup>6</sup> 当欧美殖民主义扩张把这种近代意义上的领土争夺推向亚洲时，中国传统的治权观念、制度、行为、及政策便陷入了全面危机。鸦片战争后，列强不但在清政府的震惊中或“不知不觉”中拆毁了天朝的“藩篱”，踏破了中国的“门户”，并且“登堂入室”，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内地，建立势力范围，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sup>7</sup> 清朝政府对“外藩”的相对主权不但丧失殆尽，对“内地”的绝对控制也岌岌可危。

说中国现代疆域是“历史上的中国”在清代形成后又遭到列强领土掠夺的结果，一般是不错

<sup>1</sup>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77, 82, 88-89, 101.

<sup>2</sup>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161，168页。（清）王之春，前引书，135。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56-257页。（台）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地理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80年，40-52页。

<sup>3</sup> （清）王之春，前引书，142-143，68-69。

<sup>4</sup> 马大正，前引书，398。

<sup>5</sup> 靳尔刚、苏华，前引书，21。

<sup>6</sup> Maier, 前引文，818。

<sup>7</sup> 顾颉刚、史念海，前引书，222页，“自鸦片战争之后，迄于今日，……国势益弱，外患日多，藩属被夺，领土日损，……更有失土于不知不觉之中如黑龙江口外之库页岛及南洋之苏禄群岛，皆尝收入版图，清室中叶以后漫不闻问，任人争夺，其时国人对于领土漠不关心之情形偈胜浩叹！”

的。<sup>1</sup> 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在积弱保守的清代，这个过程也包括了列强掠夺和中国抵抗两个方面。中国近代疆界画于何处，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外双方的实力，而这个疆界的确立则采取了源于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在这条疆界之外，中国丧失的主要是封建相对主权。在这条疆界之内，中国获得的则是近代绝对主权。不指明这一点，中国近代疆域变化就变成了只有领土的量的缩小，而没有属性的质的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的领土在缩小以后，就变成了中国的“现代”疆域。

二、内、外事务的区分。在封建等级或相对主权的观念下和多层次辐射状疆域关系中，对执政者来说，上、下、尊、卑和远、近、亲、疏的差别比内、外区分更有实际意义。或者说，前一类差别是后一类区分的根据。《春秋》古训，“内诸夏而外夷狄”，可谓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经世之道。清朝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开疆拓土，设理藩院，比前明更加注重经营周边和治理边地。“藩”既可“理”，从今天的眼光看，理藩院显然是一个“内政”机构。可是偏偏同俄国的关系也是理藩院份内之事。历代有“大鸿胪”一类的官职，专司对“宇内”“向化”之国遣贡使的迎来送往，但其业务范围至多只能和今天外交部礼宾司相比。同时，政府的其它一些部门也负有类似的礼宾责任。乾隆盛世，清廷将荷兰、法兰西、美国等与朝鲜、日本、琉球同列为“东夷”，可见清统治者心目中“寰宇”的扩大。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礼部把“西洋诸国”和外藩朝鲜、越南同视为“客国”，区别仅在于它们“来贡”次数的多寡和规律与否。<sup>2</sup> 在这种观念之下，近代意义上的内政、外交职能分工显然不可能在政府机构中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天朝“统御寰宇”“天下一家”的观念和政策在对付来自欧美的“不速之客”时全盘失灵。列强在中国不但宾至如归而且喧宾夺主。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执政者才意识到，欧美各国平等分立的国际制度比中国自居天下家长的做法更能约束列强在中国的行为。总理衙门在1861年开始办公。它不仅成为中国外交部的前身，也标志着事关中国领土属性的内、外权责分工的开端。此后不仅西洋诸国变成了与清廷平起平坐的外国，越南、缅甸、朝鲜、琉球也因沦于他国之手，开始了从天朝外藩向中国而言的外国的转化。天朝无邻的旧景已一去不返。中国近代外交伊始，便面临着强邻环伺的危局。直到西方和日本殖民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退潮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

三、国内主权的扩展。“古九州岛，今改制，称行省，二十二。”这是章炳麟1928年修订《三字经》时新加的内容。<sup>3</sup> 此时《三字经》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恐怕已大不如前，可是章炳麟的着意添改应该是反映了当时人对民国气象的一种认识。中国行政制度和区划的沿革有着丰富的历史。但是，在这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和中国近代国界的确立同时发生的。行政区划、建置直接反映了中央权威的控制权（或对内主权）的范围、方式、力度。近代欧美国家的对内主权在各自的国界嘎然而止，其在国界内的权威不仅不容置疑，而且充斥各个角落。与此不同，中国封建帝国的行政区划是一种主权淡出的建置。近代以来，中国外藩既失，中央政府以往对境内“内藩”和其它边地的淡化控制也已不能适应强邻压境的局面。于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和一切主权“民族国家”一样，清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强化它对境内领土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控制。

自此而起的边疆“民族政治”（ethnopolitics，又译“族群政治”），长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难点。始于清末而在以后各个时期以不同形式继续的边政改革，主要目的是使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权威和控制达到与内地省份等同的程度。换言之，这是在中国同前“外藩”的关系被迫“外交化”以后，中央政府积极致力于使原“内藩”边地在近代意义上“内政化”的过程。

<sup>1</sup> 葛剑雄，前引书，39-40。

<sup>2</sup> 范秀传，《中国边疆古籍题解》，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216-218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1995年，28页，注15。

<sup>3</sup>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0页。

清晚期，以改土归流、移民实边、驻军、设省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机制取代了清中期以前的民族隔离政策和以将军、都统府衙、土司、以及驻藏大臣多种建置统御边地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改革成为确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步骤。<sup>1</sup>影响所及，所有这些内政措施对边疆社会的冲击不亚于外部势力渗透在当地引起的社会震荡。由于地缘、宗教、社会、民族、国际环境的种种因素，所谓蒙古、西藏、新疆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延续至今，成为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为政者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四、国际主权的确立。所谓国际公法，原本是近代欧洲国家在没有更高权威的国际竞技场上以实力竞争时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可以说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在争战往来时遵循的行为规范异曲同工。正如古代中原“礼仪之邦”不施礼仪于“化外”“蛮夷”之国一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近代国际公法在向全球推行的过程中只是欧美国家施于相互之间的国际“私法”，对其它国家、地区则带有鲜明的文化歧视性。标榜平等原则的欧美“民族国家”体系，在施之于东亚后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一批殖民地和不平等条约。传统东亚国际体系和近代欧美国际体系之间的优胜劣败，取决于双方在各自文化和物质发展阶段上所形成的实力对比。结果是中国从原来居于“天下”中央的天朝地位，跌落到以西欧为中心的新兴国际秩序的边缘。而且，在不平等条约存在的百年中，中国仅仅得到“化外”之国的待遇。<sup>2</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以“四强”之一位列联合国创始国。至此，中国才在理论上获得了完整的现代主权。需要指出的是，与日本和很多亚洲国家不同，中国在近现代不仅仅是转型成一个“民族国家”和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取得完整的主权地位。<sup>3</sup>中国在二十世纪选择了“革命国家”的道路，并和苏联及其它革命国家一道向现行国际制度提出挑战。二十世纪的革命国家对现代国际体系结构有何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能够从历史上观察到的现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未能持久；以“兄弟党”、“兄弟国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往往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平等原则和利益观念背道而驰。有一点是无疑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发生于其它亚洲国家的革命一道，加速了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退潮，打破了欧美国家对近代国际体系的文化垄断，从而使这个体系真正开始具有世界意义。<sup>4</sup>

## 未终曲

以上罗列的四个方面，仅反映了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最明显的标志，远远不能概括这个历史过程的全貌。这个过程始于晚清，在某些方面延续至今。实际上，中国现代化的各个层面都与领土属性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领土属性转型的研究，可以说是从宏观历史入手，探讨中国国家结构和功能发展变化的角度之一。

可能是有感于过去二十年来国际事务中的“全球化”趋势和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族群冲突频仍、以及非国家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不成比例的角色，梅尔过早地宣布了“民族国家”领

<sup>1</sup>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sup>2</sup> 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London: Macmillan, 1991), 探讨东亚、西欧两类“国际家庭”发生碰撞后中国的“中心”和“边缘”位置的变化，认为中国在1840年以后被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但是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接受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sup>3</sup> 根据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研究，即使是在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本决策人所梦想的“大东亚共荣圈”也仅是对英美霸权的一种抄袭，而不是对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和观念的根本挑战。见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up>4</sup> Mlada Bukovansky, *Legitimacy and Power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对十八至二十世纪的“革命国家”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做了有益的探讨。

土属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东亚的“民族国家”群产生于十九、二十世纪的列强压迫之下，取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世界，从而为东、西方国际体系的比较研究写下一个句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亚洲国家都已取得了自己“民族国家”的最终形式。例如，南、北朝鲜统一问题的解决，将不仅产生一个完整的半岛国家，而且将引发南北内部机制和朝鲜半岛外交态势的全面调整。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地区，也仍然面临着新兴民族国家寻求国内稳定和定位的挑战。

作为当今世界文化最悠久的古国之一和最年轻的“民族国家”之一，中国的领土属性转型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过程。二十世纪前半期，持续的内战和惨烈的抗日战争将中华民族带入了生存空间急剧动荡变化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同盟国外交舞台上的国民党政府外交官中曾有人感慨地说：“我们身处大国的地位，却心怀小国的忧虑”。<sup>1</sup> 当时国民党政府偏据一隅，中国积弱的国势在抗日苦战中正不知终于何处，有这样的感叹自在情理之中。今非昔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日盛，国际社会纷纷预言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将居于世界领导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如台湾这样的具有潜在爆炸性的领土属性问题。台湾地位问题不同于一般国界纠纷或有关局部领土归属的争议。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它已从对外政策中的“收复失地”问题演进到今日事关“国家统一”的全方位国策。以尚未统一的国家而问鼎世界领先地位，这在世界历史上大概是鲜有先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中国近代领土属性转型的研究，不但有益于治史，也有利于经世。

## 《边疆中国》第二章

### 从“共和”到统合：辛亥回视<sup>2</sup>

“五族共和”是一道百年老题。此时旧话重提，并不仅仅是为了百年之后的那一点纪念意义，而实在是因为围绕这一理念发生的历史，同今天中国的情形有着太密切和太直接的关系。所谓五族，即满、汉、蒙、回、藏，是来自清代的族群政治观念。这并不是说清代人仅对此五族有所区别。居住于云、贵、川、广的“苗”、“蛮”、“夷”民，也曾是清政府改土归流或运用武力的对象，只是雍正朝以后，所谓“苗疆”已经基本安定罢了。<sup>3</sup> 五族之得以并列于晚清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是因为它们各自一直在清代的族群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指各族“人”的社会政治意义，还有各族“地”的地缘战略意义。清代中国的这种族群/地域结构，使清朝的统治者对中国“本部”和“疆部”区别对待，也使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的地图绘制者在“中国”（China，即本部诸省）和“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本部诸省加上满、蒙、藏、回疆）之间画出一条界线。<sup>4</sup> 19世纪是中国“本部”和“疆部”同时进入全面危机的时期，也是“内地”与“边疆”

<sup>1</sup> 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

<sup>2</sup> 本文曾以“从‘五族共和’到五域统合——辛亥革命和中国国家形态近代转型”为题，收入吴淑凤、薛月顺、张世瑛编《近代国家型塑：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13）上册，第107-138页。

<sup>3</sup> 《清史稿》，卷520，列傳299：《土司一》。

<sup>4</sup> 這樣的例子見 *Carte generale de l'Asie* (Paris: A.H. Brue, 1820); *(Composite of) Asia* (Edinburgh: D. Lizars, 1831); *Asia* (London: J. Arrowsmith, 1832); *Das Chinesische Reich mit seinen Schutzstaaten, den Landern der Mandchu und Mongolen, Ost Turkistan und Tubet, und das Kaiserthum Japan* (Weimar, Germany: Geographisches Institut,



社会之间的隔阂开始加速消失的时期。产生于辛亥革命之际的“五族共和”，表达的就是在新的政治基础之上组织多民族共同体的意愿。这个政治名词还包含了一个在字面上没有直接传达的重要意思，就是五族在地域上的统合。在辛亥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国内民族的数量和名称将大量增加，各族共处的政治框架也不断变化。基于民主的多民族政制体系自然不可能先于中国自身的民主政治，但“五域统合”的理念在中国主流政治中则一以贯之。本文试图在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框架下，重新审视发生在百年前中国的重大历史转折，目的在于说明，在中国近现代国家 / 民族构建的问题上，百年之变并非陵谷沧桑，百年之前被提上政治日程的一些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圆满答案。

## 大转型

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对资源的竞争时起，大概就具有了某种领土属性。源于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更是以领土属性作为确定民族身份、划分国家地域、维持国际关系的基本依据。近代领土属性具有特定的种种要素，反映了不同人群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共处的一些必要前提。但领土属性既不发端于近代，也不是欧洲特产。以东亚历史为例，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内的各个国家当然具有领土属性，只是有关机制不同罢了。西方列强在 19 世纪上半叶以强势凌驾于亚洲，其后开始了一个被滨下武志称为“谈判时代”，即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对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共存、渗透、压迫、以至最终取代的时期。<sup>1</sup>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近代领土属性转型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内容之一。

以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为依据，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对领土属性做出定义。但是中国的领土属性几乎和中国的历史一样久远。然而，领土属性在世界历史上的阶段性和在地域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于“控制”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以及对“边界”定义的差异。在信息电子化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国古籍中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古代代表边界概念的“疆”字，在二十四史中共出现过 1,746 次，其中以《宋史》为最多（446 次），《明史》次之（321 次）。有趣的是，“中国”在二十四史中呈现同样的情况：共 2,034 次，《宋史》以 343 次居首，《明史》以 276 次排在第二。在这些场合，“中国”多与“四夷”相对，代表中心或尊崇的地位。<sup>2</sup>王明珂认为，中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了从秦汉“华夏王朝帝国”向隋唐及其后续的“中原王朝帝国”的转化。这种转化不但打破了长城所代表的中原农耕人群和北部游牧人群之间的资源边界，也在帝国疆域内开始了华夏族群和其它族群之间的关系。<sup>3</sup>与“华夏帝国”不同，“中原帝国”不再囿于华夏人群祖居的中原地带，而是以中原为中心，囊括了长城以外的草原森林地区；帝国王朝的建立者也不再限于华夏、汉族，而间或是来自莽原大漠的入主中原者。然而，这种转化并没有改变王朝疆域如季节湖一般盈缩无常的现象。在宋代，王朝疆域始终局促于汉人地区。明朝以“恢复中华”始，但始终固守长城一线，疆域从未能达到如大唐“中原帝国”的盛况。“疆”和“中国”观念在宋、明两朝正史中的凸显，反映了这些王朝强烈的汉族心态和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的困境。

满人建立的清朝将“中原帝国”拓展到了极致，大清帝国也延续着中国历史上“边界”的实践。在北部边疆，清朝设有“卡伦”，用作边防和防边的双刃剑；清廷与东邻朝鲜约定以鸭绿江、

---

1852); *Map Of Asia Showing its Gt. Political Divisions, and also the Various Routes of Travel Between London & India, China & Japan* (Philadelphia: S.A. Mitchell, Jr., 1860); *Asi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901) 等。

<sup>1</sup> Takeshi Hamashita, "Tribute and Treaties: Maritime Asia and Treaty Port Networks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 1800-1900," 见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17-50.

<sup>2</sup> Cliff Liu, 《廿四史》iPad 版。

<sup>3</sup> 王明珂著《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3-225 页。

图们江为界，严喻“国有疆界，岂容四越”；在南边中越交界处，自广东经广西至云南，清朝设置的边关共有104“隘”，52“卡”，4“峒”，3“关”，2“汛”。<sup>1</sup>在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以强势凌驾于东亚国家之上以前，康熙王朝在对俄关系中已经开启了用双边条约规画边界的先例。

以上事实大致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和东亚各国俱有“领土属性”的基本特征。但是东亚国际社会并没有先于欧洲产生“民族国家”和相应的国际关系文化。虽然在东亚国际关系和欧洲国际关系中，实力同样是决定因素，历史在欧洲造成了实力均衡，导致了以法的精神运作的诸国平等的平面国际关系模式；在东亚，历史却容许“中国”独大成为常态，造成了以礼的精神维系的尊卑有序、立体、圆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国际政治的操盘手以维持和恢复欧洲均势为最高境界。东亚雄主却无不企望称孤中国，傲视天下。近代以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史中也曾有过“中国”式微、强邻崛起的时期。宋代就是如此。北宋国士李纲曾主张用中国历史上“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仇之邦，鲜复遣使”的经验，调整宋朝同金国的关系。<sup>2</sup>这里的“敌国”意为同中国“匹敌”之国，而非“敌对”之国。但若因此认为宋代中国与邻国处于平等关系，则是一种误解。<sup>3</sup>在历史上某些时期，行使于中国同周边强邻之间的“敌国礼”，是一种对等而非平等的关系，是位于“上国”和“下国”之间的一个关系等级。这种关系并未改变东亚的立体国际关系体系。

因此，尽管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同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在某些做法上有貌合之处，它们的神离更加突出，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观念上的两类国际行为范式。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各个国家在国际等级上所处的不同地位，使的它们的领土属性呈现出各种情况。就中国来说，当中原王朝处于大一统的状态时，中国的领土属性不但表现为对帝国习惯疆界内——既史书中所谓“版图”——人民和土地的直接统治，而且表现为对疆界以外国家和地域——既所谓“藩”、“属”国——的震慑和羁縻。近代领土属性以明确、固定、严格的国际边界，限定国家绝对主权的地域范围，区别国家的内、外事务。古代中国的领土属性则以模糊、多变、有时甚至是随意的帝国疆界，标记王朝的势力所及。而这种疆界远不足以说明中央王朝同周边诸国关系的远、近、亲、疏。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国际关系体系压制并最终摧垮了东亚宗藩朝贡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领土属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近代化”，也就是同欧美国际关系体系接轨。如果借用王明珂的资源体制分析模式，在19世纪发生的是来自海上的西方国家对沿海贸易资源界线的突破，结果是将中国纳入世界范围的经济贸易体系。生存危机迫使向来在亚洲大陆独大的“中原王朝帝国”，因卷入亚洲、太平洋的国际竞争而不能自拔，不得不向“亚太民族国家”再次转型。

中国的近代领土属性转型是一项复杂、持久、庞大的国际工程。在19世纪，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对中国边疆斧斨蚕食的列强和勉为其难却频遭失败的清政府，也有为生计而在家乡和边疆之间流离往返的汉族商、农民众，更有直接承受中国外交后果和内治措施的边疆原住民社会。对此种种，无法详述。在这里想概而言之的是，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领土属性转型已使“亚太民族国家”在外延和内涵方面初具规模。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最初外延，就是俗称秋海棠叶状的“地缘形体”。<sup>4</sup>勾勒这片秋海棠叶的国际边界线，不再是中国与个别邻邦之间的私相承诺，而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公开约定；不再是天朝帝王意志的体现，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实践；不再是模糊、游移的，而是相对固定的。于此同时，在这条边界线之外与中国为邻的，也不再是北

<sup>1</sup> 李花子著《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香港亞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7頁；《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見蕭德浩、黃錚編《中越邊界歷史資料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992年版，第259-273頁。

<sup>2</sup> 《宋史》卷360，列傳118，《李綱下》。

<sup>3</sup> 認為宋代奉行“平等”國際關係的例子，見 Morris Rossabi,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sup>4</sup> “地缘形体”是对 geo-body 的中译。这个概念首见于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方的牧猎部族国家和东、南方的进贡藩邦；一时之间，中国的传统邻邦多数沦为欧美日殖民帝国的附庸，所谓“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sup>1</sup> 在这种局面下，清政府终于改变了过去隔离中国本部和疆部的政略，开始用改土归流、移民实边、蒙藏建省、以及相关的经济、文化、交通建设等手段，对帝国疆域内满、汉、蒙、回、藏五大区域进行整合。清朝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这方面尤有建树。

## 大辩论

在西人眼中，中国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变化，已经是“对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最保守的帝国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sup>2</sup> 当时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们对局势、前景的体察与诠释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清朝最后一、二十年中，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参加者在“保皇”、“立宪”、“革命”的标签下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尽管他们立场对立且时常恶语相向，却都称得上是谋国之士。这场辩论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少有的平等对话，为世纪之交的集体历史记忆保留了珍贵的文字记录。在中国当时最缜密、敏锐、睿智的政治头脑之间展开的这场交锋，不但预示了辛亥革命的到来，更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的开题之作。本文关注的仅限于这场大辩论对领土属性转型的有关认知和问题意识。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交替的二十年中，中国已处在国门洞开、损权失地、藩属离散的境地。关于中国当时的处境和出路，梁启超用寥寥数字做了精湛的概括：“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sup>3</sup> 在天朝式微的表象下，实际是西方强势推行的全球化的汹涌大潮。中国惟有以变应变，对以前的行为甚至存在方式改弦更张。

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何为中国？在“万国蒸蒸”之势下反视己身，中国锐意改革的人们忽然发现，以近代眼光视“中国”，“中国”原来并不存在！首先，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国人的意识中不存在。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原因在于中国易于形成一统的地理特点和“孔子作《春秋》，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至太平”的儒家学说。<sup>4</sup> 其次，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实体上不存在。论者指出，欧洲国家小如瑞士者，也必有固定疆域，疆界森严；而中国之大，虽邻省如同陌路，中国之名“泛而不切，尊而不亲，大而无所属，远而无所见”。梁启超根据瑞士学者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chli）关于“国民”有别于“社会”，是构成国家的固定的集合体的学说，提出“中国号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sup>5</sup> 因为没有国家，不具国民意识，“乡族界身家界”、“省界、府界、州县界”阻碍了中国成为“一国”。于是中国无法以“团体之最大圈”参与“竞争之最高潮”，“是诚所谓列强不能瓜分我，而我自瓜分也”。<sup>6</sup> 在这些议论中，与“国界”相关的“国家”和“国民”意识，已十分接近梅尔关于近代领土属性的定义。

有趣的是，康有为和章炳麟这两位笔战的死敌，对近代国家画界而争的行为模式有着往昔不再的同感。在同革命党的争论中，康有为坚持认为只有维持清帝国的疆域，才能保住中国的“国势”。可是他在成书较早的《大同书》里却认为“诸苦根源，皆因九界”，而国界乃为万恶之首：

<sup>1</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1 页。

<sup>2</sup> 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7; Kindle Edition, 2009), Kindle locations, 4.

<sup>3</sup> 梁启超《变法通义》，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 页。

<sup>4</sup> 梁启超《新民说》，上海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2 页。

<sup>5</sup> 《中国灭亡论》，载《国民报》第 2—4 期（1901 年 6—8 月），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1 卷，第 80—81 页；太平洋客《新广东》（1902 年），同上，第 270 页；梁启超《政治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上海大道书局 1936 年版，第 2 册，第 12 页。

<sup>6</sup> 梁启超《新民说》，第 70，73 页；侠少（吕志伊）《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载《云南杂志》第 5、6 期（1907 年 3、7 月），《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 829 页。

“呜呼噫嘻，痛哉惨哉，国界之立也！”<sup>1</sup> 章炳麟写于1907年的《国家论》将国家与一切团体皆视为虚幻，而“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国界，

有大山巨渎，天所以限隔中外者，然以人力设险为多。蒙古之鄂博，中国之长城，皆是类也。又不能为，则置界碑；又不能为，则虚画界线于舆图以为分域。凡所以设此外延者，与蛤蚌有甲，虎豹有皮何异？

这里描述的，是中国古代疆界向近代疆界演进的过程。章炳麟对中国近代地缘形体的形成，赋予了一种近乎佛学的理解：“不悟天高地下，本由差别妄念所生，一切分位，随眼转移，非有定量。…故知万物外延，非理本然，实随感觉翳蒙而有。以是推求，则国家之作用可知矣”。<sup>2</sup>

到19世纪末为止，中国国家外延的走向，实是由列强的“差别妄念”和清廷的“感觉翳蒙”决定的，本没有章炳麟等书生置喙的机会。但中国是在革命呼声日炽一日、大清王朝日薄西山的氛围下进入20世纪的。中国的改朝换代历来意味着重整山河。于是，所有有志于国是的政治、知识精英都用自己的“差别妄念”为中国设计下一个政治周期。中国的政治疆域于是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

中国20世纪的第一场政治革命，再现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重整山河的通例。但这次的重整山河是在近代领土属性的理念下发生的。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政治疆域以帝王为中心，主要取决于历代开国帝王的眼界、谋略和同中原内外对手角逐的实力。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所有有关政治疆域的新锐观念的出发点，都是“国家”或“民族”。当时在所谓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展开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争论，确实代表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取向。同时，立宪派对（满清）“国家”的维护和革命党对（汉）“民族”的鼓噪，也同样反映出中国政治在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演进。当时的政治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直接脱胎于清朝“五大子民”（five constituencies）结构的“五族”（满、汉、蒙、回、藏）意识，应如何用于对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到清末为止已经成形的“海棠叶”形的帝国疆域，同中国“民族国家”的地缘形体应是何种继承关系？<sup>3</sup>

政治疆域在过去抒发的是王者情怀，在今天承载的是民族实体。这一点在世纪之交已无疑义。但是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所带来的困惑，依然通过“排满”问题造成中国政治思想的漩涡。半个世纪以前，一批西方学者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时，认为“排满”是当时中国政治潮流中“最不重要”和“最少革命性”的成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统一和强盛既不必在汉人的统治下完成，也无采取共和国体的必要。<sup>4</sup> 承认“排满”的历史合理性的学者则指出，所谓满洲问题，其实是由主张消除满汉畛域的戊戌维新人士首先提出的，而20世纪初激烈的“排满”运动，实际是由于满清廷抵御列强不力而起的一种抵抗运动。<sup>5</sup> 这里的所谓满洲问题反映的实际上

<sup>1</sup> 康有为《辩革命书》，原载《新民丛报》第16期（1902年9月16日），《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第210—217页；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04页。康氏的九界顺序为国、级、种、形、家、业、乱、类、苦。

<sup>2</sup> 《国家论》，原载《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上册，第362—7页。

<sup>3</sup> 有关“五大子民”的讨论，见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对“五族”的提法，在辛亥革命前十几年的时论中略有不同，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的中国五大族为汉、满、苗、回、蒙，没有提西藏。陈天华的《猛回头》对中国的“人种述略”指称，除汉族外，还有蒙、藏、新、满。

<sup>4</sup> 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第21页，93页。

<sup>5</sup> Edward J.M. Rhoads [路康乐],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第68—9页；Kauto Le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London: Curzon Press, 1990), 第49—50页；Peter Zarrow,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是两类汉族问题：维新 / 立宪人士提出的是汉人的权利问题；革命党提出的是汉人的主权问题。这两类问题又反映了中国政治人士在应对同一局面时的两种取向：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的必要条件，维新 / 立宪人士认为是非整合国内各族不可；革命党则认为是非以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不可。20 世纪中国民族构建的历史证明，这两种意向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但在辛亥之前，在“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被满族盘踞的情况下，二者却代表了两种敌对的立场。

“新清史”的主将之一欧立德在其著作中提出“族群主权”的概念，并以此对清代满汉政治、社会关系作出独到的分析。<sup>1</sup> 其实，这个概念也适用于中国历史上多族群在同一中央王朝之下共处的其它时期。唐朝天子被西北诸藩共同尊为“天可汗”，以及辽、金、元对“汉人”的统治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对 20 世纪初争取“族群主权”的汉族革命党人来说，最近的先例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洪武革命。然而，虽然身处 19、20 世纪之交的革命党可以借用朱元璋的口号，但已经不可能复制朱氏立国的故事。首先，从 17 世纪至 19 世纪末，清代版图在历经增削之后已固定成形，导致中国的社会精英对“中国”的相对精确的量化认知。比如在世纪之交被中国朝野竞相阅看的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在开篇之际即指出：“中国之地”包括“十八省西藏蒙古满洲等处”，“中国则有地三百五十余万英里约三百八十兆人”。<sup>2</sup> 郑氏的这种源于西方的数字概念（以英里计），与《史记》、《汉书》中“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的粗略描述，显然已分属两个时代。<sup>3</sup> 其次，同明代以汉人“族群主权”取代元代蒙古人的统治相比，20 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对汉人主政的要求，实际针对的主要不仅是满人政权本身，而是清廷所代表的中国在当时帝国主义全球化中的败局。主张立宪的黄遵宪对此败局的建言是：“吾辈处此物竞天择，至剧至烈之时，亟亟然图所以自存，所以自立者，固不在内患而在外攘”。主张革命的陈天华则疾呼：“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吗？早已是各国的了！”<sup>4</sup>

因此，明朝“恢复中华”利用的是蒙元回归大漠的良机，而 20 世纪之初中国的“族群主权”之争则面临着列强瓜分之祸。免遭此祸的途径，最为经典的是梁启超的主张：“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人类，以高掌远蹈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sup>5</sup> 梁氏的合国内诸族为一族的“大民族主义”，比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的汉族民族主义，究竟“大”在何处？显而易见，“大”不在人口，而在地域。就人口而论，汉族之大不言而喻。作为最早提出中国民族构建问题的政论者之一，梁启超对汉族的地位当然明了。他指出，中华“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必成于汉人之手”。他甚至对“排满”的政治功效也能理解。1902 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梁启超只是认为，既然大民族应当包括各族，实在没有将满人排除其外的必要。<sup>6</sup> 而当时激进的政治言论则计不出此，大有以汉人的大族小国取代满人的小族大国的倾向。

邹容的《革命军》，被同道誉为是“以国家主义为干，仇满为用”的“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

---

(Stanford: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 157 页。

<sup>1</sup> 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2</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 17 页。

<sup>3</sup>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五十七《酈食其 陆贾 朱建》；《汉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酈陆朱刘叔孙传》。

<sup>4</sup> 黄遵宪《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下卷，第 510 页；陈天华、邹容《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9 页。

<sup>5</sup> 梁启超《政治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第 2 册，第 19 页。

<sup>6</sup> 梁启超《政治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第 2 册，第 19 页；梁启超《致康有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 册，第 5937 页。

书”。<sup>1</sup> 邹容用振聋发聩的文字鼓吹“主义”，其仇满或许只是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对在清代形成的中国疆域，却带来了分疆裂土的危险。邹容提出，“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一块土，为吾始祖黄帝所遗传”，而当今朝廷即往昔之蛮夷，“其土则秽壤，其人则臃种…”。最后的“其土”句，是邹容抄袭谭嗣同的《仁学》而来，将谭氏对历史上辽、金、元的鄙视之词，直接移用到了满清身上。邹容对“中国”的疆域毫不含糊：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九州岛，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sup>2</sup>

这类文字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即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对其居住地域和其政治统治权相复合（congruence）的追求。<sup>3</sup> 但是这里提出了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个严重命题，即对“历史上的中国”的继承问题。

当时的革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十分鲜明。“历史上的中国”被分成了两大类，而“今之政府非大汉、大唐、大宋、大明，乃大金、大辽、大元之续，所谓大清者是”。<sup>4</sup> 那么革命者为之奋斗的“中华民国”，即使不自限于“禹九州岛”，那也必须是汉、唐、宋、明的继承者。1907年7月，章炳麟在《民报》上发表《中华民国解》，针对立宪派关于革命必至中国瓜分、亡国的观点，对未来“中华民国”的疆域作出了一番规划。章氏提出所谓一司二郡三荒服的观点，认为这些领土同现代中国的关系应以汉代、明代为本源，而“中华民国”对这些领土的经营，则应以文化关系的亲疏和列强的态势为根据。其中最要紧的文字如下：

中国以先汉郡县为界，而其民谓之华民。若专以先汉郡县为界者，则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隶职方，其经营诚宜稍后。…朝鲜设郡，止于汉魏，越南则上起秦皇，下逮五季，皆隶地官之版，中间阔绝，明时又尝置行省矣。…其次则有缅甸，缅甸非汉旧疆，特明代众建土司，隶于云南承宣之部，…宜居朝鲜之次。…西藏回部，明时徒有册封，其在先汉，三十六国虽隶都护，比于附庸而非属土，…蒙古则自古未尝宾服。量三荒服之后先，则西藏以宗教相同，犹为密迹，回部蒙古，直无一与汉族相通。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今者中华民国，虑未能复先汉之旧疆，要以明时直省为根本。越南朝鲜，其恢复则不易，惟缅甸亦非可以旦夕致者。三荒服虽非故土，既不他属，循势导之，犹易于二郡一司，其同化则互有难易。…若三荒服而去其一，余二者固未必自离，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于吾，则民族主义所行益广。自兹以后，二郡一司，反手可复则先汉之疆域始完，而中华民国于是真为成立。<sup>5</sup>

章氏的这段文字不是为仇满煽情而作，而是他对满清以后的中国疆域问题认真思考的结果。但是无论从民族构建还是从疆域规划的角度，章氏的主张都难以成为中华民国的蓝图。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之下，章炳麟的民族构建观着落在其它各族向汉族的“醇化”，实质是传统文化主义的翻版而非近代民族主义的提升。出于这种精神，章氏为中华民国的疆域规划选择了代表“汉”人肇始（汉朝）和“汉”人翻身（明朝）的两个朝代作为前身，对中华民国不可避免的母体——

<sup>1</sup>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卷，第28页。

<sup>2</sup> 陈天华、邹容《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第119、204、209、217页；谭嗣同《仁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sup>3</sup>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sup>4</sup> 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第686页。

<sup>5</sup> 太炎《中华民国解》，《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第738—743页。

清帝国的历史成就则采取了一笔勾销的态度。于是，在清代对中国形同异国的缅、朝、越变成了未来的中华民国“必当恢复”的领土；而在清代内附且至清末已明白画在中国近代国际疆界之内的蒙、回、藏部，反而成了可以“任其去来”的“荒服”。在20世纪初已经基本汉化并处于激烈国际竞争之下的满人故里满洲，竟连入选章氏蓝图的资格都没有。<sup>1</sup> 对中国的近代领土属性转型，章炳麟当然不是视而不见，这反映在他对古代中国“天下”所作的近代翻译：中华民国对汉、明两朝的“郡县”、“行省”可以继承，而“册封”和“附庸”之地则不能算数。可以说，章氏在民族构建和疆域规划问题上舍近（清）求远（汉、明），为中华民国设计了一条穿越时空之路。

其实，早在1899年，章炳麟就曾经建议以“封建”取代中央集权，分清帝国疆域为五“道”，各道守土入贡，从而避免列强挟王畿以制九域的局面。所谓“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因此他在辛亥前对蒙、藏、回部“任其去来”的态度也并非忽发奇想。一个重要区别是，彼时章炳麟针对的是清国蹙于列强压迫的局面，此时争辩的则是满、汉“莫能两大”的中国政治转折。<sup>2</sup>

章氏的着眼点由“国”向“族”的转移，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政治思想界最大的纠结之一。辩论的各方在褒贬不一、内涵迥异的定义下挥舞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同为中国的生存危机焦虑，在政治道路上却背道而驰。1908年朱执信以“悬解”为笔名在《民报》发表《心理的国家主义》，表明革命党人对满清国家的态度。他指出，以满人国家为我国家，无非是承认征服结果，承认客观上、法理上受治于满清政府；而只有基于民族的、主观的对国家的认同，才是心理的国家建设。<sup>3</sup> 也就是说，在革命党人的“心”中，满清国家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朱执信无法预见的是，他的议论的历史性远远超越了世纪之交的满、汉问题。“法理国家”和“心理国家”之间的错位将成为20世纪中国政党、民族政治中经久不衰的主题。

“法理国家”必须有“心理国家”支撑的观点，与“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的古训颇为相合。<sup>4</sup> 与此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中国疆域分裂的潜在危险，大大超出清政府失德已经造成的损害。对这种观点最为系统的阐述，莫过于杨度写于1907年的《金铁主义说》。章炳麟的一司二郡三荒服论就是针对此文而发的。杨度指责当时的革命煽动是“以一族之厉害为先，以一国之厉害为后”，其结果必然是汉人仅着眼于二十一省（老十八省加东三省），而蒙、藏、回部也各自祭起民族主义大旗，于是中国瓦解。因其文字的直面现实，特摘录于下：

若汉人忽持民族主义，则以民族主义之眼视之，必以二十一行省为中国之土地，而蒙、回、藏地皆非；仅以汉人全部为中国之人民，而蒙、回、藏人皆非…使其如此，则蒙、回、藏固亦主张民族主义之人也，不仅我排彼，彼且排我。于是全体瓦解，外人乘之…是五族分立说，乃亡国之策，决不可行者也。何也？今日中国之土地，乃合五族之土地为其土地；今日中国之人民，乃合五族之人民为其人民，而同集于一统治权之下，以成为一国者也。此国之外，尚有各大强国环伺其旁，对于中国，持一均势政策，而倡领土保全、门户开放之说，以抵制瓜分之说…故中国今日而倡五族分立论，则其实惟有汉、蒙、回、藏四国可分，而

<sup>1</sup> 次年，章炳麟在《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发表的《排满平议》提出，如满人愿意退回旧地，汉、满各治其地，则双方可以“解讎修好，交相拥护”。关于东三省土地制度和人口汉化的研究，见马汝珩主编《清代边疆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乌廷玉等《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James 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 China's Expansion Northward, 1644-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sup>2</sup> 章炳麟《分镇》（1899年），《章太炎政论集》，第105—107页；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同前，第199页。

<sup>3</sup> 悬解《心理的国家主义》，《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第14页。

<sup>4</sup> 出自《大学》。

满人无土地，不能独成一国也。汉、蒙、回、藏四国中，其有立国之资格者，惟有汉族之国，若蒙、回、藏决不能组织国家，以与强邻相抗。如此则蒙、回必入于俄，藏必入于英，满洲必入于日，黄河流域必入于德，云、贵、两粤必入于法，长江流域必入于英，河北一带必入于俄，而分立之四国同时俱亡，即中国亡矣。此各国均势之政策所必然者也。盖各国能保全中国之领土，则为经济上之均势，各国而不能保全中国领土，则为军事上之均势。…我既自瓜分其领土，则是与各国之持保全领土政策相抗…。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故吾尝谓今日中国国形不可变，国体不可变，惟政体可变。何谓国形不可变？既土地、人民、统治权之范围，不可忽使缩小是也。何谓国体不可变？即仍当为君主国体，而不能即为民主国体是也。…何谓政体可变？即惟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斯对于内对于外，而皆为自立求存之良法也。<sup>1</sup>

杨度因其“金铁主义”，被革命党人贴上了“曲学阿世之徒”的标签。<sup>2</sup> 他的上述反革命言论，实在比当时很多鼓吹革命的言论，对中国在 20 世纪的国家发展具有更大的预见性。虽然明言反对民族主义，杨度其实点出了 20 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之一，即大一统。若非直言反对国体改变，“五族共和”的思想在这里呼之欲出，即在新的政治基础上对大清的“帝国五域”进行整合。五域整合的障碍唯有二端：列强的觊觎；各族的阂墙。在今天看起来，虽然杨度关于革命必至瓜分亡国的预言被证明是言过其实，但他有关国形、国体、政体的一形二体论，对认识 20 世纪中国地缘、民族、国内、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中国历史都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国体、政体的改变，对国形有直接的影响。

## 大分裂

大辩论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数据，但决定事件进程的却不是口舌之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开始于武昌士兵的仓促举事，终结于三方（南京、袁世凯、清廷）两族（汉、满）的妥协，造就了一个“五族共和”的公式。<sup>3</sup> “五族”脱胎于满清帝国“五大子民”，“共和”来自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二者的结合则拜袁世凯及其幕僚的政治操作所赐。从中华民国后来的发展看，“五族共和”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最不真实的命题之一。中国国内民族的数量大大超过五族，此其一；“五族共和”仅是汉、满精英的妥协，并不是五族之间达成的共识，此其二；“五族共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将清帝国五域维系在民国之内，而中国实际上却进入了以蒙古、西藏分离为开端的大分裂时期，此其三。

1912 年肇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宣言书，表达了强烈的国家整合意识，强调民族、领土、军政、内治的统一。其中有关民族的名句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是曰民族之统一”。<sup>4</sup> 对中华民国而言，孙中山的宣言却不幸成为谏语，宣言书中所列各项统合目标，无一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现。从领土属性转型的角度观之，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民族国家化过程中的停滞甚至逆转期。在这方面，辛亥革命的成就是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正名和恢复主政地位，并使中国在国家组织形式上进入现代国家

<sup>1</sup> 杨度《金鐵主義說》（1907 年），《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3—4 頁。

<sup>2</sup> 《胡漢民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第 31 頁。

<sup>3</sup>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懿旨》，柴德賡編《辛亥革命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冊，第 183—6 頁。

<sup>4</sup>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宣言書》（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2 卷，第 1—3 頁。



之列；败笔是未能有效地继续晚清开始的国家整合，顺利地完成了从帝国到民国的在疆域、人民方面的继承。

一个复杂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对蒙、藏分离应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杨度认为革命须负全责。既然蒙、藏、回人的文化不能骤然等于汉人，汉人的兵力又不能骤然加之于蒙、藏、回，在“旧政府初灭，新政府未强之际”，边疆各族“必乘此以解纽而各离立”。<sup>1</sup> 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前，满汉立宪派人士出于对列强环伺的担忧和对立宪改革的展望，已经认为清政府与蒙、藏、回部的关系亟待加强。有人批评说，“今老大国之肢体，麻木不仁”，“今有土地而不知经营之，有人民而不知统治之，有政治而不知施行之”，长此以往，蒙、藏必失。<sup>2</sup> 辛亥之冬，康有为曾经预言，“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保”。但在民国成立以后，他还算实事求是，承认“蒙、藏之自立，起于革命之前，则不能尽责于今政府矣”。<sup>3</sup> 已经发生的历史无法回答，倘若没有辛亥革命，或是立宪成功，蒙、藏将会是何种情形？

辛亥革命对领土属性转型带来的挑战是，在族群主权易手和中央——边缘关系的政治基础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如何维系中央和边疆的关系纽带，并且不给第三国造成可乘之机。在民国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争论之间，也出现过一种所谓“帝国共和主义”，主张留皇帝虚名，行共和之实，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领土统一，各族相安”。<sup>4</sup> 显然，这种妥协方式在当时对袁世凯和革命党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结果，辛亥革命完成的方式不但使蒙、藏得以乘机“解纽”，也使周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地区渗透的步伐。

边疆动荡或许是中国在新的政治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历史研究不应因此而苛责 1911 年致力于缔造新国家的革命者。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试图指导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孙中山和同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杨度提出的所谓“国形”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目标和明确认识。反对革命的人们担心中国丧失边疆屏障，“肩背俱寒，…立国于四战之地”。这在革命党看来只是一种试图阻碍革命直捣黄龙的借口。<sup>5</sup> 辛亥革命多年以后，孙中山坦承，当时“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划去建设国家”。<sup>6</sup> 在国家的地缘形体塑造方面，恐怕尤其如此。

1902 年春，在孙中山同章炳麟之间有一次关于革命国家的地缘战略的对话。孙中山设想了革命国家在地域上的三种规模。鉴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败亡的经验，孙中山属意定鼎于另外三个地点：“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sup>7</sup> 次年，孙中山又发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认为清帝国的疆域，“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但是孙中山认为“无可保全”的是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其为列强的俎上肉，“天下亦若视为固然矣”。“无可分割”的则是在过去五六百年间“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的十八省土地。那么革命党在此情况下的策略、目标为何？孙中山主张“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sup>8</sup> 这里的“因其势顺其情”与章炳麟的“任其去来”实

<sup>1</sup> 杨度《[中国新报]序》(1907年1月20日)，《杨度集》，第208-213页。

<sup>2</sup>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哀西藏》，原载《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10月23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2-24页；袁仲《西藏》，原载《大同报》(?)，同前，第28-32页；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原载《大同报》，第5号(1908年1月1日)，同前，第36-45页；《论经营蒙藏与开国之关系》，原载《预备立宪会公报》(1909年5月31日)，同前，第94-95页。

<sup>3</sup> 康有为《蒙藏哀词(下)》原载《不忍杂志》第2期(1913年3月22日)，同前，第124-30页。

<sup>4</sup> 《宣统三年十一月口口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柴德赓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161-5页。

<sup>5</sup> 蒋智由(政闻社)《变法后中国立国大政策论》，原载《政论》第1期(1907年7月)，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第1064页。

<sup>6</sup>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下册，第140页。

<sup>7</sup> 孙中山《与章太炎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4-5页。

<sup>8</sup> 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8-224页。

是异曲同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形象地把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疆域观念描述为“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sup>1</sup>显然，在世纪之交，中国民族革命的鼓吹者并没有这种“扯皮”的意图，也尚未形成后来对中国海棠叶状领土的那种浪漫的忠贞。<sup>2</sup>

立宪派里的多数人主张维护的是清帝国之“皮”，因此不存在“扯”的情况。真正主张以中国民族国家直接继承帝国疆域的第一位“扯皮”大师，非“新民”的倡导者梁启超莫属。1912年孙中山在他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入”的言论，显示出对梁氏“大民族主义”的认可。问题在于，孙中山及其同志是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因何原因改变了原来在“民国”的民族和疆域构建问题上的近于机会主义的立场？笔者孤陋，尚未见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切实史料。1905年8月定稿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将中国国内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规定在这些区域分设同盟会支部。这些区域将蒙、藏、新、东北等地包括在内。这份文件或许可以被视为孙中山等接受梁启超意见的证据之一。<sup>3</sup>但是，这种革命政党组织在地域上的分布，也可能更直接的是为了向清帝国的进攻，而不是为了未来民国的建设。

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未来的满汉关系。1905年11月，朱执信在革命党喉舌《民报》的创刊号上着文，驳斥立宪派关于满汉可在君主立宪之下平等共存的主张，指出“民族异而不可强沟合者”，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满汉族界的破除，则必须通过反满革命才能实现。在同一期上，汪精卫以《民族的国民》为题，围绕“民族同化”表述了对中国今后民族关系的主张。汪氏认为，迄今世界上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同化现象可分为四类“公例”：均势民族重组新民族；多数民族同化被征服之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同化被征服之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同化于被征服之多数民族。汪精卫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时间属于第二种情况，而在满人入关后，中国就降到了第三公例的状态。反满革命就是要在在中国恢复第二公例。汪精卫称康、梁主张的一致对外的多元大民族主义为“梦呓”，中国的前途唯在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同化：

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今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sup>4</sup>

这种对汉族“同化力”的议论，或许意味着对中国本部对疆部的“统合力”的某种预期。但是并非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对汉族的“同化力”信心满满。次年，胡汉民在《民报》上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对民国的民族构成依然持一种走着瞧的态度：满清统治一旦倾覆，“彼必无以自存。其为胡元之穷败，遁走其巢穴，未可知也。其为氐、羌、鲜卑等为我摧夷而同化于我，未可知也”。也就是说，革命成功后满人是否仍为中国之人，满洲是否仍为中国之地，尚在未定之天。<sup>5</sup>

显然，辛亥之前革命党人对于汉人主政的追求，远比对清帝国疆域和民族人口继承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因此，中国大一统观念在二十世纪的延续，更应归于在世纪之交寻求稳定的满清政府和立宪派，而不是造反的革命党。就在《民报》鼓吹汉族革命和同化异族的同时，满清政府不仅没有效法蒙元，为“遁走其巢穴”未雨绸缪，反而积极采取措施以破除满汉畛域，目的是“使诸

<sup>1</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 1991), 第86页。

<sup>2</sup> 革命党人中也有寄爱国情操于清代形成的中国版图者，比如秋瑾就曾在日俄战争后，因中国的进一步失地丧权写下了“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的悲愤诗句。

<sup>3</sup> 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第55-56页，认为孙中山在1905年转而接受了梁启超的民族观。

<sup>4</sup> 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朱执信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1-6页；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汪精卫集》，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卷，第1-30页。

<sup>5</sup>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辛亥革命数据丛刊》，第2卷，第261页。

族相忘，混成一体”，“绝内讷之根株”。<sup>1</sup> 虽然清政府的满汉政策在辛亥之前出现了反复且根本无法遏阻革命大潮，但是在辛亥之际，中国政治各个阵营已经达成共识，即在满人统治和千年帝制在中国成为历史之后，中华民国的疆域和民族构成必须以清帝国为母体。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在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中，以及在1912年2月颁布的隆裕太后有关清帝退位的“懿旨”中，清帝国的五大子民完成了向民国五族的转换。<sup>2</sup>

然而，这种转换仅仅发生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并未实现于中国本部与疆部、汉族与各族的关系之间。在以后对这段中国历史的表述中，对事实最大的歪曲就是把孙中山说成是“五族共和”的坚定支持者，甚至是首倡者。<sup>3</sup> “五族共和”的语义，是各族以“族”而不是各族成员以“个人”为单位参与共和国政治。对这种意思最明显的表达是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孙中山对这个公式的认可，意味着从原来的一元汉族民族主义向多元“大民族主义”的游移。但这种游移只持续了几年时间。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孙中山以在野之身发表的多次讲话里，皆奉“五族共和”为圭臬，声称蒙、藏、青海、回部与汉、满一样，“今皆得为国家主体”。<sup>4</sup> 在讨伐袁世凯前后，孙中山依然保持着同样的话语模式：“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sup>5</sup>

可是从一开始，孙中山便对“五族共和”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不只一次抱怨蒙、藏“尚不尽知共和真理”，以致在外人挑拨下发生“种种背谬行为”。<sup>6</sup> 1912年夏孙中山到北京，在与袁世凯的秘密谈话中和一些公开场合，对处理蒙、藏问题表示了看法。对处于英人影响下的西藏，孙中山坚决反对武力解决，主张用宣慰招抚的办法取消西藏独立，尤其对达赖喇嘛，应“诱以爵位，饵以重金”使其就范。而对受到俄人策动的外蒙古，孙中山则主张诉诸武力：“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民初中国边疆的严峻形势，也是影响孙中山反对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一边的因素之一。他认为英、俄、日等国在满、蒙、藏、新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伤害，比德、奥要严重得多。<sup>7</sup>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表现出摒“五族共和”之名，行五域整合之实的倾向。实际上，在辛亥前夕的大辩论中，立宪派和革命党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在共和制度难以行于蒙藏回疆这一点上，已无异议。如果清末满族统治集团对“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的政治方针还寄予希望，那是因为这种方针似乎还有避免汉族革命、维持王朝体制的功用。而当时以汉族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恰恰与这种用调整族群政治来维护国体的思路相反，要求在根本改变国体的前提下重塑族群

<sup>1</sup> 端方《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卷，第39—41页。有关研究见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与元末蒙古人不同的是，由于移民和国际角逐的结果，满人在清末已经在事实上不可能将满洲作为回归的故地。因此清廷企图在内地自救，也是势所必然。见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第104, 283页。

<sup>2</sup> 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第37—45页；《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同前，第71—95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懿旨》，同前，第183—6页。

<sup>3</sup> 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对“五族共和”理念的渊源有详细的讨论。

<sup>4</sup> 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9页；《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和西北协进会的演说》（1912年9月3日），同前，第438—440页；《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3日），同前，第451页。

<sup>5</sup> 孙中山《讨袁宣言》（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页；《致黎元洪国务院电》（1916年12月13日），同前，第402页。

<sup>6</sup> 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9页；孙中山《在北京迎宾馆答礼会的演说》（1912年9月5日），同前，第447页。

<sup>7</sup> 《与袁世凯谈话》（1912年8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2页；《在北京与袁世凯的谈话》（1912年8月），同前，第427页；《在北京的谈话》（1912年9月2日），同前，第437页；《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同前，第544—549页；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1917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5页。

关系。于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中“夷夏之辨”的思想元素更新为近现代版本。在革命党那里，夷夏观嬗变为指斥清朝专制皇权将“多数优美之民族，箝制于少数恶劣民族之下”的民族革命思想。在立宪派那里，则让位于以西方政治进化论为根据，认为满、蒙、回、藏尚未进入“国民社会”，因此在中国不可骤行共和制度的国家保守主义。美国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中公认的共和制度的典范，但立宪派看到的是，美国“黑民”的无权状态会成为中华共和国以同样非人道的方式对待边疆民族的先例；革命党则许诺，在蒙、藏、回的“程度”提升之前，可按美国例，先将其置于共和边缘的“新地”地位。<sup>1</sup>这两种政治立场的共同点，是认定汉族在文化和政治上比边疆民族更加“优越”和“先进”。

但是导致孙中山放弃“五族共和”公式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边疆地域的分离或边疆民族的“落后”，而是中国本部政治局势的糜烂和汉族自身“国民程度”的欠缺。中国道统向来视中原为华夏腹心，边疆为四裔枝末。孙中山也不能离其宗。1919年秋，北洋徐树铮迫内蒙取消自治。孙中山致电徐氏，褒其再造“五族共和”的“奇功”堪追班超。然而孙中山笔锋一转，问为何“还视阉阎，颂声寂然不作”？原因就是，“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徐氏能“立功于国境”，而未能“解罪于国民”，未免本末倒置，“能保不为他人做嫁衣者，而谁敢为执事‘指徐’贺？”<sup>2</sup>

此时孙中山认为徐氏再造“五族共和”而不可贺，是因为他已决心摒弃这个辛亥共识。辛亥前革命党认为排满同推翻专制是二而一的关系，因此对南北妥协、孙袁易位，即使感觉勉强，也还算顺理成章。而辛亥以后中国的局面，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龙蛇群动，血战玄黄，名则号曰共和，实则甚于专制”。<sup>3</sup>使孙中山痛心疾首的是，“鞑虏”之驱逐和“中华”之恢复带来的却是五族离散，中原板荡。他不得不在失去满清这个对立面的情况下重新定义民族主义，以为继续进行革命的主导思想。其结果是将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从中国之内转向中国之外，并使民族主义的主旨摆脱五族多元观念的干扰，重归华夏一元的正统。

在写于1919年的《三民主义》手稿中，孙中山指出，“适逢此世界民生革命之潮流，…我不革命而甘于沦亡，为天然之淘汰而已”。在同一文里，孙中山指斥“五族共和”为辛亥之际“无知妄作者”所创，为官僚旧党所附和，荒唐之极。在满扑汉兴之后，汉族实应以美利坚民族为榜样，发扬自身的同化力，牺牲自己的血统和自尊之名，熔其他四族于一炉，造一“中华民族”，如此则必能有“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的光明前途。<sup>4</sup>如果1919年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向反帝方向的转变，那么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则表明了此时反帝国主义同汉族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孙中山及其同道在当时绝对没有对所谓“大汉族主义”的顾忌。让他们感到忧虑是汉族大众在民族精神方面的匮乏。因此，孙中山反对笼统地讲五族的民族主义，强调必须大讲汉族的民族主义，使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大民族国家。孙中山在1919年以后的讲话和文件中，以及在后来广为流传的有关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将汉族民族主义提升到“国族主义”。他坚称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都是由一个民族造成的。现在汉族以其四亿之众，却未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至于满、蒙、藏、回各族，只是“掺杂”在汉人当中的极小部分人口，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又因它们处于列强控制之下，将来只有在汉族的帮助下才能获救。<sup>5</sup>换言之，此时的孙

<sup>1</sup>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辛亥革命数据丛刊》，第2卷，第261页；杨度《「中国新报」序》（1907年1月20日），《杨度集》，第208-213页；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第375页；《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第二次会议录，十一月初一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第86页。

<sup>2</sup> 孙中山《复徐树铮电》（1919年1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69-170页。

<sup>3</sup> 孙中山《致黄仲初函》（1924年2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28页。

<sup>4</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188页。

<sup>5</sup>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2-475页。

中山不但不认为中华民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认为多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障碍。既然连汉族都要先经过民族精神的建设方能完成民主建国，边疆各族更须先向汉族同化，然后才能共享共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同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同时发生碰撞的时期。这两个主义来到中国，代表了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领土属性转型以后，中国承受的来自西方的第二冲击波。此时的“西方”已经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各自试图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识形态色彩。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苏俄谋华等等一系列事件，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时代，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的政治话语。在一段时间内，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中国的党派精英们尤其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观念的影响。最经典的例子，当属 1924 年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基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中对当时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表述如下：

中国之政治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踞，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机隍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sup>1</sup>

这份文件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经典。<sup>2</sup>此类文献显示，在收受来自苏俄的思想元素以后，中国党派精英们在对最近历史的认识上发生了蹿跳。在民国之初，孙中山曾表示对共和成立后出现的“蒙、藏不靖”的情况感到“于心有愧”。<sup>3</sup>到 1924 年，国民党已经用当下的政敌“军阀”取代“满清”作为万恶之源，短暂的愧疚心态早已不再。国内诸非汉民族也被正式冠之以“少数”的定语。文件中各民族的“自决权”和“自由联合”，是采自共产国际的语言。对国共两党来说，这些语句在当时唯一的实际意义是获取莫斯科对中国革命政党的认可。<sup>4</sup>在两党以后的历史中，这些语句从未超出宣传上的意义，在实践中带来的只有尴尬。当中国的新型政党以这种姿态登上中国族群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的大分裂早已成事实，并将延续数十年之久；独立思考者大辩论的年代也成为过去，党的意识形态将愈益支配乃至取代历史叙述。

时至 1924 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排序已经发生了变更，民族主义被排在了末位。<sup>5</sup>但是孙中山的民族 / 国族主义毕竟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它在同立宪派的争论中和辛亥以后中国政治局势中的变化轨迹，有在此作一小结的必要。

首先，辛亥前的争论发生在汉族在中国族群政治中尚处于在野地位的时期，而孙中山在 1924 年宣讲三民主义时，汉族已经重新成为中国族群政治的主体。族群主权意义上的“在野”和“在朝”，自然会导致不同的政治目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策略。在二十年代初，国民党在政权意义上的在野状态发生于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政治框架之中，与辛亥前革命党的族群政治立场已有极大的不同。这种状态后来也发生在 1949 年以前中共的身上。换言之，由于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族群主权的大前提，其后各种政治派别无论在野、在朝，其“主义”、主张都必然以汉族

---

页；《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全集》，第 7 卷，第 1 页；《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 年 1 月 1 日），同前，第 4 页；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一讲》（1924 年 1 月 27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84-196。

<sup>1</sup>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年 1 月 23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19 页。

<sup>2</sup>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28 页，将该文件列为中共文件。

<sup>3</sup> 《与梁士诒的谈话》（1912 年 9 月），《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52 页。

<sup>4</sup> 有关共产国际对“民族问题”的观点对国共合作纲领的影响，见拙著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Stanford an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 第 29-35 页。

<sup>5</sup>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 年 1 月 23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26-127 页。

为中心的中国族群政治现状为出发点。无论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还是中共的共产主义，都立足中国本部并以汉族为主体。

其次，孙中山提出缔造“中华民族”的任务，显示出从原来相对孤立的“汉族”立场转向包容他族的“国族”立场，但其族群政治的出发点基本延续了辛亥前革命党的一元立场，而不是立宪派的多元立场。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苏俄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改变。在辛亥革命前，有关边疆各族在族群认同方面向汉族同化、在政治权利方面与汉族平等的主张，已经比比皆是。即使如满族大员端方者流，也建议实行诸族混一，要清廷自撤抵御汉族同化的最后防线。孙中山等人在这方面既无理论上的建树，也无实践上的突破。对未来族群政治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国民党诸领袖则寄希望于汉族俱有超强“同化力”的神话，采取了盲目乐观的态度。

最后，在国家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问题上，孙中山接过了立宪派的观点，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华民国对清王朝帝国的继承。<sup>1</sup> 由于兼容五族的共和政治结构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加之国民党人继续汉族独大的观念，这种继承就只剩下疆域的意义。换言之，辛亥妥协所造就的“五族共和”公式完全被以汉族为中心的五域统合理念所取代。历史的实际进程无法回答：假如辛亥革命不是以各方的妥协结束，在民国肇始就规定了对清帝国疆域的传承，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在中国本部取得政权以后，是否还会致力于将一个仅包括中国本部各省的“小一统”局面，扩展为包含原清帝国诸疆部的“大一统”。唯其辛亥妥协，孙中山和国民党才得以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没有如孙氏原来所主张的，在处理中国疆域问题上“因其情顺其势”。实际情况是，中华民国的历任政府都是对边疆离异、列强干涉的局面抗其情逆其势，至少在外交上坚持了中国对蒙、藏、满、新疆等地的主权。<sup>2</sup>

在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表明了合五域为“一国”、合五族为“一人”的统合意志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最高法的形式对中国疆域作出规定，即中国领土包括二十二省加青海、西藏、内外蒙古。<sup>3</sup> 被孙中山称为“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的老同盟会员陈去病，在1914年提出改西藏为省，以防其步外蒙后尘，并对在晚清未能实施的张荫棠的治藏方略极其推崇。<sup>4</sup> 这些都反映了始于晚清的领土属性转型，在民国时期得到观念上的延续。孙中山本人在民国之初主张修建三条铁路干线，以利对中国“天然固有之殖民地”即蒙、藏、新的开发。数年后他又著书立说，希望通过同外国资本的合作，用一张庞大的全国铁路网将中国内地与边疆链接起来，对东北、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地移民开发，从而完成与内地的社会、经济整合。在同苏俄、中共的合作成立时，孙中山向外蒙古宣示：“用主义来建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以此表示国民党与北京政府不同，争取外蒙回归。而在国民党立意北伐后，孙中山已经明确，对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全中国，必须用革命力量再次征服。<sup>5</sup>

## 历史上的今天

<sup>1</sup> 《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9页。

<sup>2</sup> 1945年8月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实际承认了外蒙古独立的地位。这是一个例外。

<sup>3</sup>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第30页。

<sup>4</sup> 陈去病《西藏改建行省议》，原载《夏星杂志》第1期（1914年6月20日），《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164-169页。

<sup>5</sup> 《与上海民立报记者谈话》（1912年6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2-384页；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7-411页；孙中山《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7页；孙中山《在广州各界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9页。用铁路交通来消除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的隔阂并不是孙中山的首创。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皆有此主张。

1925年1月初，在回答逊清内务府邀其斡旋对清室优待条件的信中，孙中山在拒绝之外，建议“清室诸公”“本时代之趋势，为共和之公民。……消享者之界限，现五族一家之实”。这大概是孙中山最后一次提及“五族”的概念。此时他已病入膏肓，赴北京接受最后的手术治疗。孙中山平生拒服中药，但在手术的前两天，他问诊于中医葛廉夫。葛廉夫的诊断是“水不涵木，气火上升……”，若滋之以药食，“已耗者虽未必能复，未耗者尚可保存”。在葛廉夫开出药方之后，孙中山又问是否可有西药代替。葛大夫对以不知西医，不敢妄答。<sup>1</sup>

其时的中华民国，何尝不是沈痾未愈。孙中山早年由学医到立志医国，终其革命一生，为中国开了两副西药方。其一是来自苏俄的“党国”体制。按孙氏说法，是“把党放在国上。但此说初听之似骇人听闻，其实现在我们何尝有国？应当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爱之。”其二是效法美国的容纳、消融来自不同国籍、种族的人民，“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sup>2</sup>“党国”在中国的历史已近百年，无论对其功过如何评说，孙中山是脱不了干系的。“民族国家”则又当别论。以党造族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是孙中山，但是中国从古代王朝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在19世纪开始的，是东、西国际关系文化碰撞的产物。转型的过程和结果异常复杂，牵涉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抗衡、妥协和僵持，并非一党一派的一种政治理念所能左右。孙中山以美国这样一个移民民主国家作为有上千年专制传统的、各族有习惯定居地域的中国的榜样，试图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国家。此药方可治愈中国之疾乎？如葛大夫所言：不知西医，不敢妄答。

对于一些漫长的历史发展脉络来说，百年如同瞬间。领土属性转型便是这样的历史过程。本文围绕“五族共和”所探讨的事件、理念虽然发生在百年之前，但在今天看起来依然新鲜。原因就是，尽管中国经历了百年剧变，辛亥前后在中国政局中被视为急务的一些问题，远未成为今天书斋里的闲话。在世纪之交的种种之中，至少有如下数端值得重提。

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族群特征。无论如何评价辛亥前后的反满主义，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它在中国重新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即汉族。以后中国内部的族群政治和对外的国际折冲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征。汉族主体政治的统合/整合意识同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之间的关系，至今依然是中国族群政治的中心内容。

一是国体、政体同“国形”之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次重大政治转折都不断地证明了这种关系，提醒人们：中国的领土属性转型依然处于动态，所谓中国地图的“海棠叶”形或“雄鸡”形仅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地缘形体的相对稳定。虽然辛亥之际的二体一形关系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内陆边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和21世纪的亚洲/太平洋国际政治态势都表明，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中国的海疆。

一是现代国家合法性在“法理”和“心理”上的意义。清末革命党人拒绝在心理上承认满清国家的合法性，预示了辛亥以后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将要在同边疆民族的关系中面临的同样问题。1911年以后，“五族共和”只是东部中国政治精英们暂时的共识，蒙藏回部不仅未参与，甚至用行动表达了反对。即便如此，作为一种重构中国族群政治的公式，“五族共和”既坚持了中华民国作为“法理”国家的合法性，又承认各族“心理”要求的合理性。这种平衡在以后中国政党的纲领中不复存在。国民党在1924年前后，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曾分别从在野地位对边疆民族的分离心理或自治要求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在其余时间都是否定的。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边疆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说明二“理”相悖的情况依然存在。换言之，辛亥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在“五

<sup>1</sup> 孙中山《复清内务府函》（1925年1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44-546页；《与葛廉夫的谈话》（1925年1月24日），同前，第571-572页。

<sup>2</sup> 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的说明》（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4页；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3-474页。

域统合”方面成绩斐然，而对“五族共和”所追求的多元族群政治结构，则顾左右而言他。

一是 20 世纪中国“大一统”的时代特征。汉代董仲舒称，“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指得是中华文化广被天下的盛世盛况。<sup>1</sup>“大一统”原义代表的是文化自信、开放。子曰：“近者说，远者来。”<sup>2</sup>用所谓软实力号召天下之道，中国古已有之，但是不能行于近世。在清末，陈天华在其《狮子吼》中，用当时流行的种族观点描述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红种陵夷黑种休，滔天白祸亚东流”。<sup>3</sup>清末立宪派主张用维持清帝国的一统江山来保护中华命脉，并以来自西方国际关系文化的民族国家地缘形体，作为中国自卫的政治武器。这种消极的“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当不多见。这种观念产生的背景是外围列强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渗透，“统”的直接对象则是边疆各族。辛亥之际的革命党人对此初不以为然，而后则奉为正统国策。20 世纪中国为政者用制近者以拒远者的策略，应对列强环伺的外围国际环境，用统合疆部和本部的举措，确定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地缘形体、资源边界、邻国关系。今天中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地理位置巩固和中国内、外关系结构的形成，历经晚清、北洋、国民党、共产党历届政府。问题是，辛亥百年之后，中国的危机一统观念是否仍在继续，盛世一统的时代是否临近到来？

## 《边疆中国》第三章

### 时间、形体和颜色：中国“崛起”三境界<sup>4</sup>

在其新著《论中国》中，二十世纪中美关系中最老辣的外交家之一基辛格认为：与其把中国看作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基辛格并不是中国特殊论的始作俑者，他只是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而已<sup>5</sup>。与其他类似观点不同的是，基辛格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是无独有偶——两国都不是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两种“大陆文化身份的表现体”。正因为如此，在新的千年期开始的今天，中美共同面临一个新的现实：“两国因为如下原因而互相需要：双方都是泱泱大国而不甘俯首，各自又固持个性而不会改弦更张，彼此却弥足珍贵而不能相互孤立。”<sup>6</sup>在书的结论中基辛格更是语出惊人：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公布我的秘密访问达成一致时，他说：“这将会震惊世界。”  
四十年后的今天，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动世界，那将是何等完美的结果！<sup>7</sup>

这段话不仅是对 21 世纪的祈愿，也折射了历经两个世纪之久的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巨变。这种巨变的意义，只有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才能认知。

<sup>1</sup> 《汉书》卷 56，列传第 26：《董仲舒传》。

<sup>2</sup> 《论语》《子路》第十三。

<sup>3</sup> 陈天华《狮子吼》，第 94 页。

<sup>4</sup> 本文初稿为 2011 年 12 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太平洋战争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英文版首次发表于 *American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2012 年秋季刊。

<sup>5</sup>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69-170. 在基辛格以前，英国政治家邱吉尔曾称印度是一个“地理名词”。1945 年以后中国内战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个概念套用到中国身上。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称中国为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sup>6</sup> Kissinger, Kindle locations 7964-7965, 7475-7477.

<sup>7</sup> Kissinger, Kindle locations, 8125-8127. 1971 年 7 月 15 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公布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



回溯 19 世纪，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在 1868 年同美国政府签订了同西方国家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即《蒲安臣条约》。马克·吐温是当时对中国心怀友善和最少偏见的美国人之一，他随即写了一篇有关《蒲安臣条约》的长篇评论，其中有如下段落：

[这个条约] 预示着在中国同世界之间将开展巨额的利润丰厚的商业贸易。美国在其中仅取应得的一份，别无他求。这份条约也预期着一个强国的兴起，因为中国将受益于一种更加纯洁的宗教和一种更为高等和完善的文明。这个条约以广泛的正义、启迪和进步的利益为基础，所以它一定会持久。它是横跨太平洋的桥梁，它使鞑靼人[指清朝]的壁垒崩塌，它以新鲜、年轻的血液激励着这个在众国之中最受尊崇的国家，使其精力勃发<sup>1</sup>。

可见，尽管马克·吐温对中国十分赞赏，他只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将中国人视为即将受到美国榜样启迪的人民。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确实没有止于现状，而是剧变迭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以自己在中国的传教和教育活动直接参与了中国的近代转型。他在 1906 对中国的变化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是一个舞台，正在展现地球上一场最为伟大的变动……。这个变动的目的不是改朝换代，也不仅仅是对政府的形式进行变革。这个变动更崇高和更深邃的动机是，对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最保守的帝国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丁韪良相信，他正在目睹中国人“团结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之下，他们要告别过去并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以求得新生”。他对自己的如下提问已经有了答案：“我们难道不应该满怀信心地期待，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我们基督教兄弟国家的一员吗？”<sup>2</sup>

五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宣告了王朝历史在中国的终结。但是丁韪良所预言的“彻底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立即发生。当中国效仿的榜样——西方文明，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潮的时候，中国即将加入基督教兄弟国家的乐观预言也变得遥遥无期。大战结束后，年轻的中华民国依然经受着草创的阵痛。战时的列强外交使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感到悲观：“如果中国被别的国家视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那么和谈将会一事无成”。中国人民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对巴黎和会的抗议，说明芮恩施不幸言中。一度曾经鼓舞人心的“威尔逊时刻”，只在中国人心中留下遭人背叛屈辱。在芮恩施眼中，美国丧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比[美国]现在更好的机会，可以同时以顾问和朋友的身份，去帮助另一个巨大的国家和可爱的人民来实现他们追求生活改善的愿望。自愿地寻求合作，自由、自发地希望以自己所欣赏的制度和办法为榜样——这是国与国之间不用强权手段和阴谋诡计相互影响的唯一方式。而这正是中国人对于美国的心态。可惜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份信任的珍贵。<sup>3</sup>

基辛格对中国的看法和他的这三位美国先贤有明显的区别。他不再鼓吹中国应以欧美为嚆

<sup>1</sup> Mark Twain, “The Treaty With China, its Provisions Explained New York Tribune, Tuesday, August 28, 1868” (Kindle Edition, 2011), Kindle locations 289-291, 294-297.

<sup>2</sup> 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7; Kindle Edition, 2009), Kindle locations, 4, 16, 39.

<sup>3</sup>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and Toronto: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2; Kindle Edition, 2010), Kindle locations, 60, 116-7. 关于“威尔逊时刻”的讨论，见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矢，而是将中、美视为两个对等的文化模式。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中国同西方、美国的关系遵循着何种历史走向？马克·吐温、丁韪良和芮恩施都确信，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可以通过效法文明先进的西方恢复往昔的辉煌。基辛格则立论于亘古不变的“中华”本质，强调中国和美国在保持各自文明特质的前提下，共同承担对全球责任。三位先贤显然服膺于典型的西方文明使命论，这在今天已经变身为“西方与世界”（West and the Rest）这一历史主题。基辛格则似乎对另一个更为古老的命题——“中国与天下”——有所感悟。他对中美关系的议论也因此与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有异曲同工之趣。<sup>1</sup>

我们如果不把历史视为紧密联系的整体，马克·吐温时代所祈望的“西化”中国和基辛格所认知的“中华”中国之间的鸿沟就难以逾越。历史进程实际上已经展示了马克·吐温笔下中国的前景和基辛格眼中的中国的来源，也证实了美国在中国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当下国际政治中的时髦议题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意义，有关讨论很容易使人误以为这些都是新问题。其实，中国最新一轮再次崛起的过程，比在邓小平时期开始的中国改革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曾经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中国的对头或者是不情愿的伙伴。但美国也曾担当过更积极的角色。

本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时间跨度中重新审视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主旨在于说明，在中国重新崛起的道路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过渡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在二战时期以一个强国的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是得力于美国战时外交的引荐；今天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重提，历史仍在继续。

## “时间”视角下的东、西方文化碰撞

在亨廷顿提出有关后冷战世界的文明冲突论之前，费正清已经创立了用“西方冲击”解释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所谓文化冲突学派<sup>2</sup>。以此为基础，入江昭教授将文化因素引进了美国与东亚国家外交史的研究中，引起了这一学科的重大发展。其经典著作《实力与文化》在实力和文化的两个层次探讨美日之间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关系，认为战争中的美日实力抗争，并未改变日本民族在发展道路上向西方靠拢的总体文化方向。<sup>3</sup>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经历显示出各自同西方的关系有明显的不同。近代日本借助西方模式步入强国之路，而中国却在截至几十年前的漫长时间里陷入所谓“发展的僵局”，其原因经常被归结为对西方模式的顽固拒绝。中国近年来日益彰显的不同于西方强国的崛起方式，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成说。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未缩小中、西方之间的宏观文化距离。然而，尽管有理由质疑用源于西方的“近现代”概念界定十九世纪中叶后的中国历史，仅以“最近的”来界定这段历史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这种界定传达的只有时间的自然意义，而回避了时间的社会性。在“最近的中国史”的概念里，既不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看不到

---

<sup>1</sup> “西方与世界”是近年来很多西方著作的主题。有关的例子有 Alice H. Amsden,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Penguin Press, 2007),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Penguin Press, 2011), Meic Pearse, *Why the Rest Hates the West: Understanding the Roots of Global Rage* (IVP Books, 2004),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以及 Roger Scrut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Globalization and the Terrorist Threat*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02).

<sup>2</sup>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8), 106; Fairbank, *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32.

<sup>3</sup>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西方在近现代对中国产生的深刻影响。<sup>1</sup>

在历史研究中，时间无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表明在特定的时间跨度里，人类的活动有某种取向。当审视历经沧桑的东、西方关系时，采取一种大跨度的历史视角，并确认在这个跨文化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特定组织形态”（particular organizing mode）——即时间的社会属性，会有助于了解这个关系的历史取向。<sup>2</sup>

当分属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不同国家和人民主要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地域范围内的时候，双方的偶尔接触会使造访的一方，为适应不熟悉的主方文化环境而作某些临时的自我调整。这就如同今天的跨洲旅行者，在长时间的飞行后需要倒时差一样。这样的文化接触会给身历者带来各种感受甚至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感受和印象都因过于细微和零星，而无法造成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决定性的影响。于是，近代以前，东、西方在彼此漠不关心的状态下共存，以各自的方式刻画流逝的时间。<sup>3</sup> 当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十九世纪到达亚洲时，一场深刻的变革改变了东、西方的相处方式。中国语汇中“势”的概念，即由实力和影响造成的事态走向，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这种变革。作为弱势和相对“落后”的一方，亚洲各国被迫在社会意义上甚至在自然意义上同西方“对表”。<sup>4</sup> 对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化对于当时中国的影响，梁启超是这样形容的：“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sup>5</sup> 从这次东、西方碰撞及其后果中，历史学家得出了那个备受争议的、有关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时间视角。从此，亚洲社会的“进步”与“落后”，“发展”与“停滞”，都源于西方的“现代”理念为准绳。

日本的现代化和强国之路没有挑战西方的时间框架，而是严格遵循了西方列强的行为先例和模式。同日本成长为西式强国的经历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一直在现代暨西方的时代试图找回自己在亚洲事务中失却的中心地位。迄今为止，中国追赶西方的每一步似乎都进一步彰显了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换言之，中国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其实是通过吸收和应用西方文明的某些元素，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重新崛起与其说是对西方的实力竞争，不如说是文化上的挑战。2011年9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或许是希望取得对外宣传的柔性效果，白皮书的作者们用“和平发展”取代了多少带有刺激性的“和平崛起”的概念。但是，白皮书宣称，中国将打破过去欧美日崛起的“强国必霸”的先例，以和平、和谐的方式取得强国地位，这无异于宣布东方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之道的复兴。<sup>6</sup>

这自然不是传统的中国之道。在跨越19世纪和21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中国经受了来自西方的两次冲击波。这两次冲击分别开始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第一次冲击重塑了中国的地缘形体，第二次冲击改变了中国的颜色。

19世纪的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大国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归并到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帝国主义。西方列强的帝国构建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形体。当欧美列强通过占据殖民地和扩张势力范围将自身重塑为不可名状的地缘怪兽的时候，许多西方以外的政治实体也开始了获得“民族国家”形体的历程。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参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成为民族国家，拥有被国际边界所标明和限定的国家主权。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是，亚洲国

<sup>1</sup>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x-xii.

<sup>2</sup> Gordon Marshall,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33-4.

<sup>3</sup>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18.

<sup>4</sup> 实力在这里不仅指军事力量。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即来自内陆草原的强大王朝或帝国在用军事实力征服中原社会以后，并没有将他们的固有文化加于中国之上。中国在自然时间上和西方对表开始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17世纪中叶为清政府修改历法。

<sup>5</sup>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见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sup>6</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6日，取自 [www.xinhuanet.com](http://www.xinhuanet.com)。

家在历史上首次具备了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固定的地缘形体 (geo-body)。<sup>1</sup>

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化不可避免地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邦交之道是将与国按远近亲疏区分等级，维持羁縻、藩属、客国、敌国等分门别类的等级关系。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被以国家平等为原则的西方国际关系所逐渐取代。虽然清朝入主中原和源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欧洲国际体系几乎发生在同时，到了 19 世纪，中原王朝奉行的用模糊、移动的边疆缓冲地带维持安全的帝国谋略，已经明显不敌以严格的国际边界为民族国家壁垒的所谓国际通例。当中华帝国的最后版本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寿终正寝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地缘形体比喻为一片海棠叶。在 20 世纪，随着这片海棠叶的政治意义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嬗变，围绕着中国这片土地发生了一系列相互抵触的国际和族际的诉求、运动、冲突、交涉和战争。

颜色政治在形体政治之后接踵而至。使用“颜色”来定义政治意识形态是 20 世纪常见的现象。冷战时代把颜色政治推向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标以红色。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被一再警示，不能容许中国的红色江山再改变颜色。当改革开放在邓小平时代开启后，中国产生了关于颜色的反思。面向大海的象征世界性自由主义的蓝色和固守大陆的象征中国保守主义的黄色，成为这场反思中的对立色彩。颜色只具有象征意义。历史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是在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经受了第二波西方冲击以后，中国选择了什么方向？

第二冲击波是在西方本身发生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格分裂以后到来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面对的已不再是被笼而统之地称为“洋人”、“洋货”、“西法”的铁板一块的“西方”。苏联共产主义和欧美资本主义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发出了对立的意识形态符咒和物质影响。在中国国内发生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搏斗，并不完全反映在西方世界进行的两大潮流的竞争。然而，这场搏斗决定了中国在 20 世纪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国家建设模式。中国在近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已经在西方引起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通过浅度全球化获得高速经济发展的样板。中国虽然投身于世界贸易，但并不依照国际规范改变自己的国内法规和行事方式。<sup>2</sup>其实，对中国来说，全球化的到来是分期和多样化的，中国领教过的国际规范也不止一套。1949 年以后，中国曾经“一边倒”向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而且根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革命。

时至今日，中国的形体和颜色仍存在不确定性。在中国沿海，虽然以华人的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大中华”观念得到普遍接受并起到文化、经济联络纽带的作用，沿海华人社会如香港、澳门和台湾至今依然保持各自有别于“大陆中国”的政治身份。同时，在更古老的大中国或中华大一统的视野里，在中国海疆的相反方向，即处于中国内陆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历史遗留的“边疆”状态，而尚未同“内地”统合。至于颜色，很难确定中国是否还是、或从何时开始不再是红色。近年来在国内出现的关于“唱红”的争论，至少反映出经济飙升中的中国，仍然对“国家颜色”问题存有某种焦虑。

但是，在某些美国人眼里，中国经久不衰的一党制和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存，恰恰“将使中国在 21 世纪的两种价值观、政府制度和现代化模式的冲突中扮演主角”。<sup>3</sup>换言之，中国的“国色”依然有别于美国，因此将是美国观念、价值、制度的全面挑战者。这种说法的意义在于，在冷战时期，苏联曾因此被美国视为主要敌手。不同的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反映了源于欧洲的

<sup>1</sup>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是一部在亚洲历史框架下探讨“地缘形体”的经典之作。

<sup>2</sup>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Kindle Edition, 2011), Kindle locations, 192, 1498.

<sup>3</sup>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sic Books, 2010. Kindle Edition, 2010), Kindle location, 192.

两种现代化版本的对立。<sup>1</sup>可是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实具有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明，在今天已经成为其中一种版本的翻版。中国或许正在准备超越最初分裂西方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一个更新了的东方强国的姿态，向世界展现其魅力。历史发展的趣味性在于，今天使美国人士感到困扰的“强大中国”，在几十年前曾经是美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

## 美国打造的“强大中国”

时间上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历史上的时间只能向后看才能认知。尤其对几千年来经历了多次轮回的中华文明来说，时间经常同时具有向前和向后的意义。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近代转型，同时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经过又一次分裂与统一、衰落与崛起的循环。在这个从崩溃走向重建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到此中国跌至谷底，从此中国开始振兴。

这方面的证据在战时历史中比比皆是。在失去亚洲中心地位后，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着亡国的危机。而中国也因抗战首次开始获得国际尊重。中国的战时外交不仅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在国际舞台上空前活跃，同西方盟国建立了打败轴心国、重建世界和平的伙伴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达到顶峰，蒋介石成为有史以来与西方强国首脑共举高峰会议的首位中国领袖。然而，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这些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首次”，只不过是恢复中国应得地位和历史角色的必然步骤。

中国的重新崛起并不是和平开始的。中国的民族自信心首先是在顽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取得的。当英美等国还在试图摆脱与法西斯轴心国打交道时的孤立主义和绥靖情绪的时候，中国已在孤军奋战，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的坚持抗战激励了中国人民重建国际形象的信心。政府人士开始谈论中国负有将世界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共同体的重大使命。在同其他政府的交往中，中国政府也不再将自己仅仅描绘成需要同情的侵略的受害者，而是和平与人性的捍卫者。<sup>2</sup>中日战争和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国际政治的性质。以前列强围绕各自在中国的条约特权所进行的所谓“中国事务”，此时几乎完全消失了。

战争促生了中国的新外交。中国政府不仅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这些老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立场，而且积极寻求发挥中国在亚洲战后重建中的作用。中国战时新外交典型地反映了一种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徘徊的心态。二战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都以反对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为出发点。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外交的决策人面临着一个历史难题：如果西方强权在战后从亚洲全面退潮，西方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将由何种新秩序来取代？显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中华朝贡帝国体系是不可能死灰复燃的。

当时，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杰出的中国外交人才，如王宠惠、顾维钧、宋子文和胡世泽等都投身于使中国重新进入国际社会的努力。他们竭力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一个进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这种紧跟西方节拍的努力并没有为中国在国际上取得显著进展。西方盟国在二战中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也使中国政府失望。中国政府人士认为，除了向世界承诺建立一个自由的战后国际秩序之外，宪章必须增加西方列强放弃殖民政

---

<sup>1</sup>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sup>2</sup>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化供应社，第76册（1978年）第370页；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Collected Wartime Message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1937-1945* (New York: John Day, 1946; reprint, New York: Kraus Reprint, 1969), 118-9; 蒋介石致罗斯福，1937年12月24日，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 Volume II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C.: G.P.O. 1954), 832-3（以下引为FRUS）。

策的内容<sup>1</sup>。中国政府把印度独立问题作为检验西方盟国承诺的试金石。蒋介石不止一次敦促美国在印度问题上向英国施压，以免美国自己的自由民主形象受到损害。<sup>2</sup>

由于不满西方盟国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中国的战时外交家们开始从中国历史中寻求智慧。尽管不可能重返过去那个傲视六合、万邦来朝的天朝时代，中国的战时外交依然致力于在欧美和日本殖民帝国的废墟中恢复中国在亚洲事务中的中心地位。源自春秋时代的“存亡继绝，济弱扶倾”观念被用来概括中国的外交境界。这种王道精神甚至被施之于暴敌日本——日本战败后应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精神解放”。中国外交的自我警示是，推行此道的关键，在于重新采取被遗忘的基于中国历史的世界观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事务观。<sup>3</sup>在抗战时期，对这种观点最为权威的表述是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在其后的战争岁月里，书中的有关文字被中国外交部原封不动地用来指导其对中国战争与和平目标的计划。<sup>4</sup>

中国民气的上升和国际同情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衰弱和政治分裂局面的消失。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屡次表示，尽管中国在道义上和精神上足具强国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会对一个缺乏实力的中国马首是瞻。由于物质力量方面的原因，中国目前还没有资格充当强国。<sup>5</sup>参与战时盟国外交的中国外交官们，也从亲身经历中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国身处大国的地位，却心怀小国的担忧。”<sup>6</sup>中国在战时的“强国”地位，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唤醒中国人民对于辉煌过去的骄傲和激发他们对未来福祉的期待。可是在当时，这种强国地位只是来自美国政府的一份外交礼物。

美国的这份馈赠给得并不容易。当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危机在1940年下半年开始严重恶化的时候，蒋介石向英、美政府指出，它们只有改变百年来视中国为半殖民地的态度和开始对中国平等相待，才有可能获得中国在战争中的全面合作。<sup>7</sup>此时的中国尽管已经通过对强大入侵者的卓绝抵抗赢得了国际尊重，但是中国的战后前景和在反轴心国战争中的作用远未明朗。美国民众多半会同意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意见：“中国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重新成为强国。”<sup>8</sup>罗斯福总统另有卓见。他认为仅仅对中国平等相待是不够的。罗斯福确信亚洲和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是“使中国脱离现状”。针对中国尚不具备强国实力的现实，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他决心“使中国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时候也能出人头地。”<sup>9</sup>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曾被冠以“豺狗外交”、“门户开放”、“金元外交”等名目。这些都是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历史包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刺激下，美国

<sup>1</sup> 王宠惠致蒋介石，1942年7月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册，第796-8页（以下引为《初编》）。

<sup>2</sup> 蒋介石致罗斯福，1942年1月7日，《初编》第1册，第154-5页；蒋介石同威尔基的谈话，1942年10月5日，《初编》第1册，第760-2页；Aron Shai, *Britain and China, 1941-1947* (London: Macmillan, 1984), 58-61; John Sbraga,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olonialism in East Asia, 1941-1945* (New York: Garland, 1983), 68-9, 72-3.

<sup>3</sup> 外交部备忘录，《太平洋上殖民地问题与一般安全问题》，1944年6月7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胡世泽文件（Victor Hoo Papers），第3盒；外交部备忘录，《主席对于外交方面指示》，无日期，出处同上；邵玉麟等编著，《王芄生先生纪念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无日期，第43-4、48页。

<sup>4</sup> 外交部备忘录，《主席对于外交方面指示》，无日期，胡世泽文件，第3盒。

<sup>5</sup> “Reminiscences of V.K. Wellington Koo,” 5(a): 249；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9卷，第347页（以下引为《蒋总集》）。

<sup>6</sup>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at Dumbarton Oaks, September 9, 1944,” 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顾维钧文件（Wellington Koo Papers），第75盒。

<sup>7</sup> 蒋介石同英驻华大使卡尔的谈话记录，1940年10月14日，《初编》第2册，第39-40页；蒋介石同美驻华大使约翰逊的谈话记录，1940年10月14日，《初编》第1册，第100-2页。

<sup>8</sup> Cordell Hull, *The Memorie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2: 1586-7.

<sup>9</sup> Franklin D. Roosevelt, *Complete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3-1945* (New York: Da Capo, 1972), 18: 325; “Record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and Mr. Hopkins,” July 16, 1943,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宋子文文件（T.V. Soong Papers），第32盒。

政府确实开始了对亚洲事务的新思考。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一批官员和亚洲事务学者相信，解决目前亚洲的危机的最好办法是造成一种“中国新秩序”，其步骤应包括日本撤离中国，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以及解决中苏之间的双边问题等。这些步骤将使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获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并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巩固国内稳定和新的国际地位。<sup>1</sup>这个意见得到罗斯福的赞许。1941年间，罗斯福将力倡上述看法的拉铁摩尔派往中国，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战时调整对华政策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状态，而是为了重新定位中国在美国大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显然是遵循美国在西半球奉行干预主义的历史传统，罗斯福总统主张在战后对日本实施“警察式”的监管。他向其他盟国领袖竭力推荐将中国列为战后世界的“四大警察”之一（包括美、英、苏、中）。除了中国在地理和日本靠近以外，美国需要中国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是太平洋战争同盟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对西方盟国同日本在“种族”问题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至关重要。<sup>2</sup>因此，作为在世界范围内抗击轴心国并须在战后分担对全球不同区域的责任的“四强”之一，中国得到了美国的外交礼物——顶极其诱人的“强国”桂冠。

中国历史充满了中原王朝皇帝用堂皇的头衔对藩属和朝贡国君主进行册封的事迹。然而在现代国际社会，“强国”的含意是实力地位而非空洞的名号。根据美国外交协会在战时发布的一份研究的定义，强国需要具有广泛的国际利益和承担广泛的国际义务。与一般国际关系中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不同，实力地位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权利执行能力和政治军事责任履行能力，将它们划分为等级。<sup>3</sup>据此，落后、分裂的中国在当时根本不具备充当强国的资格。对经常追思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的中国官员来说，罗斯福总统此时对中国赠与“强国”头衔的做法，不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1942年新年伊始，美国以“强国”看待中国的“好消息”传到重庆。大概是有感于中国在历史上的和今天的“册封”关系中地位的颠倒，蒋介石的心境十分复杂。他在日记里写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sup>4</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政府中对中国军力薄弱的一致意见，促成了“中华强国”的战时神话。美国在战争中的欧洲优先战略大大限制了美国对中国提供援助的能力，也暴露了美国自身在物质实力方面的不足。为了使中国能够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从中国的社会心理入手。1942年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心理战委员会建议：“目前对中国进行物质支持的实际困难表明，需要运用心理战影响中国战事的进程……对美国娴熟的心理操控策略来说，当代中国几乎是一张白纸”。<sup>5</sup>从这种意义上讲，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承诺给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其实是进行了一次最高层次的心理战。

对中国来说，开罗会议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承诺，其实际意义是在地缘形体和面积上恢复中国曾经享有的过去。从中华民国成立之日起，中国政府就反复宣称对前清领土范围的继承。但是在

<sup>1</sup> Owen Lattimore, "Alternatives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tober 15, 1940,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1-44), t-b17; Blakeslee to Hornbeck, May 20, 1941, Hoover Institute Archives: Stanley Hornbeck Papers, box 29.

<sup>2</sup>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50), 572-3, 716-8; Memo on the meetings between Roosevelt and Eden, March 22, 1943,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Harry Hopkins Papers, box 329; Memo by Maxwell Hamilton, February 27, 1943, *FRUS, 1943: China*, 14-5; Hull, 2: 1586-7; memo by Hornbeck on a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Roosevelt, November 20, 1944, Stanley Hornbeck Papers, box 367.

<sup>3</sup> Arthur Sweetser et al., "The 'Grading' of States," January 4, 1943,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War and Peace*, P-B 57.

<sup>4</sup> 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8月6日，《初编》第1册，第715页；古屋奎二，《蒋总统密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78年版，第13册，第15页。

<sup>5</sup> JPWC 3, "Suggested China Plan," March 16, 1942,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icrofilm reel 13.

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中国领土也继续受到列强的侵犯。因此，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就中国领土和东亚其它问题达成的谅解，这是西方列强自19世纪闯入东亚以来，开始历史性退潮的第一步。但是，开罗决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摧毁日本帝国，而不是背书中华民族，中国的领土问题远未结束。除了西藏问题和外蒙古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外，美国对台湾回归中国的支持也暗含了对这个战略位置重要的岛屿的隐秘心机。同时，罗斯福在开罗的外交表演严格遵循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台词。他对蒋介石表示的由中国在战后充当朝鲜和越南的“老大哥”的意愿，完全不予理睬。“老大哥”的东方式理念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是无法界定的，它也使人想起古代东亚国家间的等级秩序。<sup>1</sup>

当然，并不像某些美国官员所说的那样，美国以强国对待中国的政策仅仅是权宜之计。罗斯福总统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家，他推行开罗外交是出于一种长远信念。<sup>2</sup>在开罗会议召开前几个月，中国外长宋子文会见了罗斯福。宋子文的主要目的是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他以美国对中国的期许作为向罗斯福要价的依据：“你要我们行使世界警察的职责，但是警察是需要武装的。”<sup>3</sup>罗斯福的回应表明了他对中国看重的原因：“就算蒋介石去世了，……中国还在那里。即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再次分裂，中国依然如旧……拥有四亿二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国注定将成为远东的强国，成为我们完成伟大事业必不可少的帮手。”<sup>4</sup>

此番对话不仅典型地反映出战时在华盛顿和重庆之间的强、弱伙伴的讨价还价，也揭示出中美长远的历史关系在“时间”意义上的特点。宋子文的听似抱怨的话语说明中国的时代尚未到来，中国此时所谓的强大只是美国赐予的名义。罗斯福则押宝于中国的强国潜质，并预见到中国的强国之路将充满荆棘。罗斯福决不希望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势”出现变化，即使有朝一日中国成为强国，也应依旧只是美国的助手。换言之，既然西方已经处于领导地位，那么东方最好紧紧跟随。

## “古老”与“年轻”的优劣

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共和国之一。然而，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的这两个特质似乎都是弱点：“年轻”意味着不成熟，“古老”意味着守旧过时。在某些外交场合，自认软弱和不成熟会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在二战期间，蒋介石表现出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态度，并告诉他的美国客人，中国愿意在所有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多年以后，在另一种国际环境下展开的中美外交中，周恩来用这样的语言试图打消基辛格对中国的疑惧：“我们两国之间隔着太平洋。你们的国家已有200年的历史，而新中国只有22年的历史。因此，我们的国家比你们的年轻。”<sup>5</sup>在这些场合，中国都有求于美国，但是中国领导人都未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附庸。在漫长的20世纪，中国人一直在不断地寻求重新定义中国的“年轻与古老”的双重性公式，变古老=过时为古老=恒久，变年轻=不成熟为年轻=勃发的生命力。

二战时，蒋介石及其同僚们认为自己肩负着传承中华文明和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双重使命。在他们心目中，尽管中国国力在物质方面尚待提升，但是在道德和精神方面，中国不弱于任何国

---

<sup>1</sup> 关于美国在二战期间对中国领土问题的有关政策的研究，见拙著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以及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 War, Diplomacy, 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sup>2</sup> “Autobiography [of Stanley Hornbeck], 1942-1944,” Stanley Hornbeck Papers, box 497.

<sup>3</sup> “Note on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on Aug. 30 1943 from noon to 12:45 p.m.,” 宋子文文件，第32盒。

<sup>4</sup>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ong and Roosevelt, August 30, 1943,” 同前。

<sup>5</sup> 蒋介石同居里会谈记录，1942年7月30日，《初编》第1册，第675-6页；Kissinger, *On China*, Kindle locations 3832-3833.



家，理应是亚洲的领导者。<sup>1</sup> 相比而言，美国的战时外交致力于把中国改造为“统一、友好、繁荣、强大和走向民主”的国家，期待中国同时弥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欠缺。<sup>2</sup> 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战时的中国问题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参与决定战后国际问题的主要盟国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又将是战后需要进行重建的重要区域之一。所以，在考虑中国问题时，美国战后外交计划无法将中国视为一个功能健全的强国，而必须质疑中国怎样完成统一？中国怎样繁荣经济？中国怎样强大起来？<sup>3</sup> 这些问题不是美国的物质援助或外交礼物所能解决的，它们涉及到中国国内的价值观和制度等根本而微妙的问题。

中国国家制度按照西方模式开始全面革新的时刻始自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中国是孕育民主的良田沃土。但是，对一个在八千年 [原文如此] 中完成自我塑造的文明是不能突下猛药的。毕竟，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王国，共和形式的政府是突然强加上去的。这个国家目前还处于调整时期。”芮恩施以向中国执政者进言为己任，试图说服他们按美国模式塑造中国的共和体制。只是芮恩施时运不济，他的一半任期是在袁世凯独裁统治下度过的，可以说他经历的绝望多于希望。<sup>4</sup> 美国对中国国内事态发展的纠结、观望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时期。1943 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西方被普遍斥之为“排外”之作。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方面的资深官员洪贝克则主张宽容。他认为中国仍处于革命的紧要关头，为了获得同中国的长远合作，美国必须容忍中国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来的荒唐愚蠢和恼人的过激言行。<sup>5</sup>

总的来说，美国政府人士并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意味着民主制度在东亚的胜利推进。美国的战时外交策划理所当然的是以防止日本威胁在战后死灰复燃为目的。但是在讨论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时，美国国务院内部无法就盟国是否有能力在日本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参与这场争论的一名官员吃惊地注意到，此时的气氛与 1918 年竟会如此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曾毫不怀疑的认为民主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sup>6</sup> 而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政府不仅难以确定敌国日本的民主前途，就是对主要盟友中国的民主化也难以促进。宋子文曾经向罗斯福总统的助理之一霍普金斯宣称，他自己的使命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缔造一种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亲密、持久的关系。可是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很难使美国官员将两国视为天然盟友。太平洋战争迫使两国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美国的外交圈里也开始认为中国人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不同，在中美两国间的共性多于差异性。可是美国的政策精英们依然认为，美国有义务指导中国的民主发展。<sup>7</sup>

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迎合美国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蒋介石曾公开声称，在反对轴心国的斗争中，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和苏联这“五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

<sup>1</sup> “Reminiscences of Wellington Koo,” 5(a): 249; 《蒋总集》，第 19 卷，第 347 页。

<sup>2</sup> SR document, “China”, n.d., Records of Harley Notter, box 11; memo by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utline of long-range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China,” January 12, 1945, Top Secret General Records of Chungking Embassy, China, box 1.

<sup>3</sup> Memoranda by Joseph M. Jones, “What do we desire of China?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and “China,” n.d., Records of Harley Notter, box 11.

<sup>4</sup>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Kindle location, 238-9.

<sup>5</sup> Note by Hornbeck, September 25, 1943, Stanley Hornbeck Papers, box 425.

<sup>6</sup> Bishop to Hornbeck, December 14, 1942, Atcheson to Hornbeck, December 28, 1942, and Hiss to Hornbeck, December 30, 1942, Stanley Hornbeck Papers, box 237; T-58, December 3, 1943, Iokibe Makoto, e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U.S. Planning Documents, 1942-1945* (Bethesda, MD: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1987), microfiche, i-c-8.

<sup>7</sup> Soong to Hopkins, April 4, 1942, Harry Hopkins Papers, box 220; Johnson to Hull, May 24, 1932, *FRUS, 1932*, 4: 36-40; Johnson to Hull, November 3, 1937, *FRUS, 1937*, 3: 654-5; Hornbeck to Hull, September 16, 1939, *FRUS, 1939*, 3: 250-1; 居里讲话的中文译文, 1941 年 4 月 16 日, 《初编》第 1 册, 第 608-17 页; Currie to Roosevelt, March 15, 1941, *FRUS, 1941*, 4: 81-95.

必须团结一致。<sup>1</sup> 而美国却并不认可重庆自诩的民主。在这方面，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帕特使居里向蒋介石传达了意向：

根据我在万里之外的观察，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农民、妇女和日本的态度值得赞赏。因此，他们同国民政府大同小异。我们真切地希望他们 [指国、共] 能消除分歧，联合抗日。如果双方的差异是2比8，那么联合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如果是4比6，那么两方比较容易达到一致。后一个比率同样可以用在中美两国关系上，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可以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怀疑。<sup>2</sup>

罗斯福总统的意见除了对中国战场的局面表示担忧外，还是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关注。尽管不满罗斯福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蒋介石还是欢迎居里的到来，因为这毕竟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步。<sup>3</sup>

1942年的夏天，当中美战时合作达到高峰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的时候，罗斯福派居里再次访华。居里同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战时合作和战后重建的谈话。其中的一些谈话显示出美国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走向十分担忧。居里提醒蒋介石，中国只是在不久前才从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目前，为数众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缓慢进步表示失望，并且害怕中国在战后会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居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避免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是亚洲的领导者。他特别强调：“在有关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问题中，[罗斯福] 总统最为关注的是战后中国政府的形式。美国正在尽最大努力促进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相比中美贸易的发展，总统更急切地希望看到和平、民主政体在中国的实现。”<sup>4</sup>

中国的历史发展曲线刚刚开始上扬，就已经在美国引起负面的反应。美国人眼里的中国政治的“不成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的担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中国政府在战时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似乎使美国政府相信自己足具优势，可以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多半是出于这种心态，居里才会对蒋介石做出下面这番家长式的说教：

我个人认为，中国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赢得更多的尊敬，而不是以为这种尊敬是中国理所应得的。中国和先进的西方强国的关系可以比喻为青少年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青少年在成长期间会认为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但父母对此却不愿认可。最终孩子需要通过自己的行为与行动赢得自己的地位，只是一味坚持这种地位是他应得的，是行不通的。中国近些年来对日抵抗已经赢得了尊敬，但是必须赢得更多的尊敬。

中国立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居里的现代话语框架里，中国的历史纪录并不能帮助蒋介石驳斥居里以孩童形象矮视中国的议论。在谈话中蒋介石回避了中国“成熟”与否的问题，而是建议改变中美对话的心态：

见总统时，望告以中、美基本心理之不同，实为引起种种误会之因素。中国方面

<sup>1</sup> 《蒋总集》，第18卷，第410页。

<sup>2</sup> 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1年2月8日，《初编》第1册，第542-4页。

<sup>3</sup> 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1年2月8日、26日，《初编》第1册，第542-4、591-5页；《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30、138-9、144-5、164页。

<sup>4</sup> 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7月22日，《初编》第1册，第639页；Gauss to Hull, June 17, 1942, *FRUS: China, 1942*, 732; 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8月4日，《初编》第1册，第698-703页；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8月3日，同前，第680页。

以弱国之立场，备受外患压迫之经验，造成一种遇事即准备抵抗之自卫态度，在心理学上，可称之为“低能心结”。美国方面，以强国之立场，自不免流露睥睨一切之“优越心结”。尚我两国能设法免除此种心理上之成见，则亲睦之增进，无可限量矣。<sup>1</sup>

这段对话的意义已不再限于战时中美外交，需要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跨文化关系的语境下理解。居里的家长制作作风源于西方的典型观念，认定落后的中国必须紧随发达的欧美国家的步伐。蒋介石则被现代中国既古老又年轻的双重特质所困扰。他既不愿意对强势的西方话语甘拜下风，又无法理直气壮地捍卫时处弱势地位的中华文明，于是只好退守在中国已郁结一个世纪之久的“受害者心理”。

居里返美后，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里写道：“我向蒋介石反复强调，美国在中国的真正利益所在是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现代国家。我们认为美国的安全与民主边疆的扩展息息相关。”<sup>2</sup> 二战中的事实是，尽管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中国提高了国际地位，美国政府在中国拓展“民主边疆”的努力却是一筹莫展。在两次访问中国之后，居里认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意图是“与美国结盟以在远东抗衡苏联，用武力清算中共，获得美国的财政和经济援助而不管中国政治是否朝向民主”。<sup>3</sup> 对当时的美国政府人士来说，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而带有这些不良政策倾向，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在战争余下来的时间里，蒋介石政府的作为未能如居里所建议的那样赢得西方盟国更多的尊敬，美国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将其“强大中国”外交维持到底。在战争进行到1944年的时候，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官员向中国方面坦承：美国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在中国收效甚微，中国政府军队的拙劣表现辜负了美国的支持。<sup>4</sup> 一名在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注意到：“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热情的衰退。与六个月前中国所享有的声望相比，这一衰退十分令人惊讶。”<sup>5</sup> 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范宣德一直对把中国奉为强国的方针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中国的国力只称得上是二流国家”，而美国外交却以“道德和声望”为由视中国为强国，这只能使中国陷于困境。另一方面，范宣德指出，时代确实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此美国必须“避免回到战前那种对中国‘民族’漠视或居高临下的态度”。<sup>6</sup> 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未能在战争需要和长远计划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1945年2月，为了确保尽快击败日本，罗斯福总统同斯大林在雅尔塔签订了牺牲中国权益的秘密协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倒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态。

中国官方声誉在华盛顿的下跌只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一面。另一面是延安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上升。国民党政府总是向美国人说明，中共听命于共产国际，不顾中国的自身利益。在世人还不知道冷战为何物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对美国做出承诺：“中国而坚强有力，则太平洋上制止共党之猖獗，当由中国任之……战后中国将为美、俄间之缓冲”。<sup>7</sup> 对罗斯福政府来说，蒋介石

---

<sup>1</sup> “Excerpt from minutes on my conference with Chiang Kai-shek on August 6, 1942,” Roosevelt Library: Lauchlin Currie Papers, box 4; 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8月6日，《初编》第1册，第715页。居里的纪录内容在中方纪录中缺。

<sup>2</sup> Currie,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August 24, 1942, Lauchlin Currie Papers, box 4.

<sup>3</sup> Currie to Roosevelt, November 11, 1942, Roosevelt Library: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box 132.

<sup>4</sup>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h.h. [Hopkins],” October 10, 1944, 顾维钧文件，第77盒；孔祥熙致蒋介石，1944年11月16日，《初编》第1册，第202-3页。

<sup>5</sup> H.G. Nicholas, ed., *Washington Despatches, 1941-1945: 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405.

<sup>6</sup> Memo by John Vincent, “Background and brief no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d. [November 1943], Records of Division of China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ox 1.

<sup>7</sup> 蒋介石同居里谈话记录，1941年2月8日，《初编》第1册，第542-4页；蒋介石同威尔基谈话记录，1942年

石的这种思路对于盟国的军事合作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前景都十分危险。早在同蒋介石在开罗会见之前，罗斯福就通过宋子文向国民党政府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真心希望不会对八路军动用武力。他们的所为含有健康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良好成分。你们不应对这些宝贵的东西视如草芥”<sup>1</sup>。

从1944年初开始，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系列出自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约翰·戴维斯之手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国民党政府可能会迫于美国压力进行一些短期改革，但是“中国共产党极有可能代表了中国的未来”。<sup>2</sup>与罗斯福私交甚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卡尔逊曾目睹中共的敌后游击战术。他因此对中共倍加赞扬。卡尔逊在1944年2月也致信总统：“现在看来时机已经成熟，应选派一名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人到华北进行初步工作，为使我们在太平洋的作战能造成东方和西方的联合预作准备。……民主行动的源头在华北，在那里我们能够得到最可靠的情报和最坚定的支持。”罗斯福在给卡尔逊的回信中说：“关于中国，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华北尤其如此。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派你回到那里。”<sup>3</sup>虽然卡尔逊未能重返华北，他信中的建议却实现了。1944年夏天，美国政府派遣了一个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被中共领导视为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1944年8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联名致信卡尔逊上校，实际上是间接致信罗斯福总统。以下是英文原信中一些段落的译文：

过去几周，第一批美国军官已经到达延安，我们将作为盟友共同制定抗击日本的合作方案……美国朋友的到来是一个重要的、期盼已久的事件。我们向来认为，只有我们与盟军共同作战并协调我们各自的行动，才会使我们的斗争更加有效……我们坚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的敌后斗争和我们盟友的战斗永久分隔……今天由18名军官组成的美军观察组已经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相互印象很好……虽然我们仍然遭受封锁，灾难性的反共反人民和消极抗战政策仍在中国继续，但是战争的现实让我们与美国第一次建立了联系。

卡尔逊很快就将信转给了罗斯福。在给卡尔逊的回信中，罗斯福写道：

很高兴看到来信。重庆的事看起来稍有改善。我希望并祈祷重庆与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能够找到真正解决目前情况的办法。<sup>4</sup>

正当卡尔逊和罗斯福在美国相互通信的时候，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中国进行多次谈话。毛泽东十分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能在美国帮助下建设民主。他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用自己的言行为民主做广告……我们中国人毕竟将美国看作是民主的典范。”毛泽东担心，美国在战后会重新回到孤立主义，让中国“自我煎熬”。他问谢伟思：“美国政府真的关心未来在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吗？比如，美国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的民主化是否认为重要？”毛泽东下面的这段话对美国听众来说应该十分入耳：

美国人会发现与我们合作比跟国民党合作更容易。我们不但不怕美国民主的影

---

10月5日，《初编》第1册，第766页。

<sup>1</sup>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ong and Roosevelt, August 30, 1943, 宋子文文件，第32盒。

<sup>2</sup> Hopkins to Roosevelt, February 2, 1944, February 7, 1944, September 8, 1944, Harry Hopkins Papers, box 334; Davies to Hopkins, October 22, 1944, November 16, 1944, 同前。

<sup>3</sup> Carlson to Roosevelt, February 23, 1944, and Roosevelt to Carlson, March 2, 1944,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box 27.

<sup>4</sup> Carlson to Roosevelt, October 28, 1944, and Roosevelt to Carlson, November 15, 1944,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box 27.

响，而且我们对此十分欢迎。我们没有那种只想学习西方工业技术的愚蠢念头。

1

正如牛军在他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指出的，在中共走上世界舞台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很大作用。<sup>2</sup>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中共与美国短暂的、历史性的合作历程。虽然美国特使赫尔利在1944-45年调停国、共失败，罗斯福并未因此放弃希望。1945年4月，罗斯福在去世前不久会见了埃德加·斯诺。在回答斯诺关于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态度的问题时，罗斯福说，“是这样，我现在在中国同时与两个政府打交道。我会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使他们联合在一起”。<sup>3</sup>作为一名务实的政治家，罗斯福总统希望用雅尔塔密约来补救他对国民党政府潜力估计过高的失策，因此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了损害。但是罗斯福从未改变他对中国人民的基本看法。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重申了他的信念：“尽管中国暂时还很虚弱并且面临着革命和内战的风险，但总有一天，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会团结一致，实现现代化，并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力量。有朝一日，中国将会在远东获得日本企图攫取的主导地位。”<sup>4</sup>

## 时过境未迁

历史前进的脚步是通过一个个历史时刻来显示的。无论是旷日持久的历史年代还是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都不会重复出现。它们只会留下长长的投影。这也是我们今年举行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和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原因。在这一年里，这两个事件在不同的纪念场合分别受到关注。它们其实是同类的议题，应放在一起讨论，因为这两个事件都是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的重大历史时刻。本文更多关注的是历史参与者的话语和思想而不是历史事件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蒋介石、毛泽东、罗斯福以及他们的外交官在二战时期的所言所想，被历史学者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重新检验。他们所言是否即他们所想？抑或他们是在有意误导？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跨度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意图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站在不同国家和政治立场上的所言所想都证明了一个发生于二战时期的历史事实：中国正在重新崛起并会因此而震动世界；中国崛起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在世界上增加一个实力国家，更重要的是在时间、形体、颜色的三维意义上向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文化提出挑战。

立足于太平洋两岸的历史参与者在七十年前的所言、所思、所悟，对今天的跨太平洋对话应有所启迪。同七十年前相比，中美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华强国”已不再是一个外交辞令中的幽灵，而是在沃尔玛连锁店和中国各大电视台国际频道随时可见的事实。然而，跨越太平洋的话题在今天与七十年前的仍有许多基本的共同点。当下对中国重新崛起的种种议论并不总是意识到历史的存在，但历史就在那里，无可逃避。

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前，仅一纸《蒲安臣条约》就启发了马克·吐温用“跨越太平洋的桥梁”来想象中美关系。到了二战时期，中美之间的交往已经发展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对错综复杂的战时中美关系，罗斯福总统也说过一句有关“桥”的话：“或许有一些桥会断裂，但没有任何断裂是桥梁所不能跨越的。”<sup>5</sup>在今天以信息、网络、跨国公司为时代特征的世界，中美关系的广泛与紧密程度已不能用一座或几座桥所来比喻。正如本文开篇引用的基辛格的观感所示，

<sup>1</sup> “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 August 23, 1944,” Joseph W. Esherick,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295-307.

<sup>2</sup> Niu Jun, *From Yan'an to the Worl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5).

<sup>3</sup> 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A Personal View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72), 348.

<sup>4</sup> Thomas M. Campbell and George C. Herring, Jr., ed., *Diaries of Edward R. Stettinius, Jr., 1943-1946*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5), 210.

<sup>5</sup> Roosevelt to Currie, September 12, 1942,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Official File, 3719.

在今天，中美所代表的两大国家体系和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盘根错节、互为连理。这种关系大大超越了一般的双边国家关系，在当下除了对全球的影响之外，还继续着已有上百年的东、西文化接触。对中国来说，一些二战时期提出的老问题今天仍在：什么是决定中国生存与发展取向的“时间”框架？中国是否还在重塑“形体”和确定“颜色”的过程中？对美国来说，如何应对中国重新崛起的问题，在今天的真切性和迫切性，远非二战时期可比。罗斯福的比喻可以再用一次：太平洋两岸对这些问题答案的探求可能会造成一些“断裂”，但对“桥”的恒久信心是世界在二十一世纪的希望。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欢迎加入并转发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74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